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卓继辉	陈伏金	林 山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汪征鲁	赵麟斌	陈伏金
	卓继辉	林 山	陈章汉
	黄文山		

《闽都文化》总第 72 期 2021 年第 1 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 版 单 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卓继辉
执 行 主 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编 务 主 任	王 坚
编 务	单 南 何财铭
装 帧 设 计	乔 麦
封 面 摄 影	王 取
本期责任编辑	王春燕
地 址	福州鼓楼区天皇岭弄 1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 子 邮 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闽 都 文 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志刊号	CN-35(Q) 第 0093 号
印 刷 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 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请在投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Contents

P4



人间至味

P8



闽江口董家

P39

不老的夹漈山



世味流年

- 4 林碧莲 人间至味

闽都世家

- 8 董山静 闽江口董家
- 14 文 净 翠旗谷口万松风

船政之光

- 21 高 熔 闽系海军的形成和发展
- 29 方百年 海军宿将刘冠雄
- 36 陈长极 “伏波”号沉没

八闽文脉

- 39 黄文山 不老的夹漈山

坊巷春秋

- 42 江 雁 古巷韶光
- 47 陈绍钦 赵麟斌 曾经的“下体井”

岁月写真

- 53 陈 芬 “省府路1号”的前世今生
- 58 潘一风 中山路大院纪事
- 63 边 集 民国初期“福州一中”的“校长争夺战”

Contents

P53



“省府路1号”的前世今生

P77



南方有佳人

P86

冶山漫步



左海风流

- 67 梁从诫 倏忽人间四月天
——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

名镇名村

- 74 刘长锋 祖泽家声湮水浪
- 77 赖 华 南方有佳人
- 81 孙源智 枕峰古渡头

福地山水

- 86 郝苏平 冶山漫步

在线读城

- 91 郑敬平 福清有个“台湾村”

- 封面 (摄影) 王 取 郊野公园
- 封二 (国画) 陈济谋 天下无花白到梅
- 封三 (书法) 陈俊杰 正义书院楹联
- 封底 (剪纸) 董雅萍 福文化

人间至味

林碧莲

人间至味，不过是那一碗米饭。

某日，与三五同学到仓前路吃烤鱼，酒足饭饱之际，同学建议打包剩菜，我不以为然地说：“菜没什么，我想打包那剩饭。”同学们以惊诧的眼神看着我，此后，我就有了“饭桶”之雅号。其实，我非常无辜，那米饭圆润晶莹，Q弹清甜，口感非常好，是难得的好饭。菜再好吃不过是众

多调料调制出来的，过餐就变味了。

何况，我来自永泰乡村，是农民的女儿，触摸过每一粒米饭背后的辛苦和汗水，每一粒米都能让我尝到父母的心血。

在早春的寒气中，父亲早早地下地了，要把翻晒了一冬的泥土用溪水浸烂，用犁耙把土坷一遍一遍地打烂，搅成稀烂的泥；山坡上的梯田



有的面积太小了，牛进不去就得用脚踩，把去年的稻茬踩进泥土里，磨它，磨得粉碎，和泥土烂在一起，成为细腻黏滑的泥浆从趾缝间吱吱地冒出来。把田埂边杂生的野草也锄下来一起踩进泥里，沤烂了就是肥料。稀软酥烂的地整好了，布谷鸟叫了，要育种了。

父亲和母亲十分严肃地孵稻种，仿佛面对祭祀一样神圣庄重：把谷种泡在温水里，时不时地试试水温，偶尔低声交谈几句，表情肃穆，用着我们听不懂的语句；有时夜里，父亲还把稻种搁到灶上加温，偶尔在睡梦中听到门“吱呀”一声响，那是父亲起来察看稻种。我们被气氛所感染，都小心翼翼地走路、吃饭，就像家里住了一位稻神，不敢得罪。有的家庭稻种没发好，要一家家去问去求别人把多余的秧苗分给他。时候已过，重新育种是来不及了，误了农时，就误了一年的耕种，一家人的粮食就没着落。谷种发好了，就撒到做好的秧床上，白天晒太阳，夜晚浸水，温度和水的深浅都要小心把握。稻种光溜溜地躺在秧床上，没有一丝泥土的遮盖，是麻雀最便利的口粮，因此要赶麻雀。麻雀很机灵，赶了这头落在那头，小小的我在空荡荡的田野上跑来跑去，只有偶尔路过的人打声招呼，久了就松懈了。有次被父亲抓到，晚饭后狠狠地抽了我一顿鞭子（父亲擅长秋后算账，基本上都是在晚饭后把当天犯错的孩子叫到房间里“动刑”，既避免奶奶她们的劝护，也不落我们的面子）。弟弟长大后就和我轮流值班，弟弟做了弹弓来打麻雀，果

然轻松很多。有一次奶奶来替我们，不懂得用弹弓，拉反了，把脑门砸出一个包，我们捂着嘴一路狂奔回家，而后大笑。

秧苗长好了，一垄垄的水田也养好了，水面平得跟镜子似的，整个村庄亮闪闪的。在绵绵春雨中，农忙开始了。母亲拔秧，父亲插秧。母亲在秧田里，一边打瞌睡一边挣扎着拔秧。她每天4点多就要早起煮饭，喂养牲畜；白天和父亲一起到田里劳动，回家就煮饭、喂猪、喂鸡鸭，收拾家务；晚上照顾4个孩子的起夜，从未睡足过，终年顶着黑眼圈，时常在劳作的过程中就睡着了。有一次，她挑着一担大粪上山浇灌李树，一走神滚下山坡，肋骨摔伤。母亲一生操劳，却从未得到良好的休息和营养，体力严重透支，到60多岁时全身骨质疏松，动辄骨折，甚至脊柱塌陷，卧床近一年，受了很大苦楚。

炎热夏天，在充足水分与日晒下，禾苗长势很好，密密麻麻地近我们膝盖那么高，田里要薅第二遍草，我们的苦日子又来了。薅草是以五指当梳，疏通田地的筋脉。禾苗是按“井”插种在水田里的，薅草要为每一株禾苗疏通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其意义不仅是除去杂草，更重要的是挖松泥土，挖通水路，挖断禾苗侧长的根须，抚平泥面，这样才能使水肥均匀地在田中流动，滋养每一株禾苗。我们伏下矮小的身子，在烈日下弯着腰，脸几乎要触到尖利的叶尖，五指插入泥中，在错杂根须中“劈山开路”，抓起沙石，扔出田外。拔尽野草，踩入泥下，扯断根须，抚平

泥土。手指尖的皮很快就磨破了，被撒了肥料的水浸泡着，针刺般疼，头两天最难受，久了，就渐渐麻木了。只是晚上睡觉时在梦中依然能够感到十指火辣辣的，过几天才好，长上一层薄薄的茧。弟弟常常想办法去樟树上找绿毛虫的茧套在五指上，但一下子就磨破了，没用的。再苦，我们也不敢偷懒，薅草的时令很短，迟了就会影响禾苗的孕育，直接影响收成。而我们如果偷工减料，母亲是要返工的，这时节父亲在外打工，农活扛在母亲一个人身上。

割稻季节，是田野上最热闹的季节。学校放农忙假，让学生回家帮忙割稻谷，其实老师也要回家割稻谷。村庄里，打谷机的声音此起彼伏，乡亲们忙忙碌碌地穿梭在村子里，喜气洋洋地讨论着今天割了几担稻谷，哪一块地亩产多少，用



了什么稻种，施了几次肥。一般都会几家“轮工”，今天帮东家，明天帮西家。我们家有个四伯公，身体好，干活勤快，是个庄稼的好把式。他割稻特别快，跟我父亲投缘，每年都会和我们家“轮工”。他喜欢我焖的米饭。我们家有个小灶，专门焖饭。泡好米，量好水，放入锅中，在水快要沸时，翻一次锅，防止粘锅，水沸后用小火焖熟，中间不掀锅盖，焖出来的饭香气扑鼻，嚼劲好。四伯公每每满足地吃上三大碗，并不怎么吃菜。据说四伯公从前是国民党的保安队长，后来接受劳动改造，妻子改嫁，儿子流落在外。四伯公孤身一人生活，却从不懈怠，认真侍弄庄稼。去世时，他给流浪在外的儿子留下了七八十担金灿灿的稻谷。在农人眼里，那是一笔丰厚的遗产。

冬天寒冷，农人们都歇息了。在三中读书时，晚饭后常常散步，外婆家就在乡卫生院的后面，很近，逛着逛着就到了。一生勤劳的老生产队长——外公这时节闲在家里，总会招呼我：“天冷啊，喝一杯好啊，来吧。”外公并不怎么会喝酒，他的米酒味道不冲，薄薄的，喝上一小杯不会醉。有时我就喝上一杯，外公就趁机调侃我这个书呆子。有一次闲聊，外公告诉我：“把葫芦和红薯嫁接，可以让红薯一颗一颗挂在架子上长。”这确实挑战了我的认知，我目瞪口呆又满腹怀疑，外公却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外公走了很多年了，却始终不肯告诉我答案。我至今对此将信将疑。我和外公并没有血缘之亲，但母亲却是他抚养大的。他是一个敦厚的人，父亲十分敬重



他。我妈是老大，所以在外婆家我是这一代的第一个小孩，小时候经常待在外婆家，因为有特殊待遇——吃白米饭。但那时却不常和外公相处，他都在地里忙。印象最深的是：我喜欢跟外婆去菜园子，外婆家的菜园子特别好玩，有好多我没见过的菜，墨绿的青椒、红红黄黄的尖椒、叶子圆圆的葵菜、胖嘟嘟的花菜和大白菜，都是外公侍弄的。我白天跟邻居孩子跑到外面玩，每到饭点回家，看到外婆在烧菜，外公吃着锅巴坐在灶下休息，帮外婆烧火。原来饭煮好了，锅巴也起出来了，外公吃着中间焦黑的部分，旁边薄脆香甜的地方留给我。

我们家生活不富裕，一粥一饭都是父母亲手经营出来的，父亲总让我们把饭吃饱。农村的孩子皮，跑来跑去，运动量大，容易饿，父亲让母亲三餐多煮饭，这样我们饿了就可以随时回家吃

剩饭。记得上小学时，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开碗橱，吃剩饭。然后才开始煮饭、喂鸡、喂猪。长大后，我们姐妹身高会比堂姐高一点，堂姐抱怨说是因为伯母不给她们剩饭吃。因为买不起肉菜，父亲就选好米来种，让我们有好胃口，哪怕好米产量低。

一次在东街口散步，看到小巷子里一家卖绿色粮食的店，上面赫然写着“红米”，再一看价格令人咂舌，我十分好奇地上前察看，果然是“旧相识”。红米味道与普通大米差不多，但有一股独特芳香，只是产量特别低。初中时，我们家就种有红米，我是寄宿生，带着红米到校，许多同学稀奇，跟我换米吃。平时表弟他们到我们家，回去总会对外婆说：“姑姑家饭好吃。”周末同学来我家住，也会念叨：“你们家饭好吃。”父母总会十分高兴地说：“家里没什么菜，你们要把饭吃饱。”现在我们养育孩子，也是强调不要浪费粮食，把饭吃饱。我至今还吃着父亲种的糯米，圆的。“圆术”才是“术”啊，妹妹常常感叹。老家话称呼糯米为“术米”，而“术米”有椭圆形的和长条形的，椭圆形的香、筋道。

我产后有一段时间情绪非常低落，常做梦回娘家吃饭，糯米饭，大大满满的一碗，贪婪地嚼着，满足地吞咽，体会着那充实着喉头和肚子的筋道与香滑。那个梦境陪伴了我很长时间。

米饭滋养着我的身体，也充实着我空虚的灵魂。

米饭后面站着我的如庄稼一般朴素的亲人。

闽江口董家

董山静

董氏宗祠当是闽江口琅岐岛上规模最大、装饰最精美的祠堂。这座宗祠始建于明嘉靖年间，重修于19世纪20年代初。1997年董氏宗亲又捐资百万重建，精雕细琢，耗时2年竣工。宗祠融古今建筑风貌于一体，金梁玉柱，流光溢彩，美轮美奂，气宇不凡。

宗祠占地面积约1380平方米，主体建筑共有五进，面积达600多平方米。祠门牌坊为楼阁式双檐歇山顶，雕龙画栋的横匾上写着“正谊堂”三个金色大字。《汉书·董仲舒传》云：“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也是琅山董姓族裔堂号得名来历。

祠前的明埕，立

有一对石狮，朱红大门上方刻着“董氏宗祠”，楷书端庄、苍劲有力。董氏后人饮水思源，不忘祖恩，祠边一直保留着两口古井，活水纯净甘醇，流淌至今仍未干涸。“梨园井”开渠于南宋绍兴年间，另一口为明嘉靖年间董伯章所开，并由宰



琅岐董氏宗祠



董公泉

相叶向高命名为“董公泉”。古时候井的作用不仅用来洗衣、做饭、洗澡，还可防火，毕竟宗祠大都是使用木质材料建造的。而在董家后人心中，这两口古井则更有深意。它们寓示着董姓一族源洁流甘，世代长清。

步入宗祠的东大门，映入眼帘的抬梁穿斗木构架，工艺精美，造型生动，可谓巧夺天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木头香味。这种清香有别于祠堂的香火味，悠长绵延而又含蓄深沉，仿佛亲人和乡邻的气息在祠堂上空氤氲不散，温暖而又亲切。

祠内檀椽斗拱，悬钟流金溢彩，藻井人物、飞禽走兽、云龙翔凤栩栩如生。站在天井中央可看到屋面为金色琉璃瓦，飞檐翘角，彰显出庄严肃穆与古朴灵动的气质。

董氏宗祠的后面有一座花园叫“豢龙园”。传说董氏的始祖董父，是轩辕氏黄帝的裔孙，为舜帝驯养扬子鳄（古代称龙），以事有功，得赐

“豢龙氏”，即董姓。

在琅岐，每一种传奇风物都浸染了江涛与海浪的气息，董氏宗祠亦是如此。琅山董氏的族谱里记载，九世祖董纯永，原籍河北范阳，大致在今天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位置。北宋靖康元年（1126），金兵铁骑南下，攻占开封，掳走徽宗、钦宗两位皇帝，史称“靖康之难”。随后宋室南迁。南宋高宗绍兴初年，董纯永举族避乱，“衣冠南渡”，成为琅岐董氏的开基先祖。

琅岐，古称琅琦、嘉登岛。琦，美玉之意。闽江好似一条龙，美丽的琅岐岛就像含在龙口里的一颗耀眼夺目的明珠。物阜民丰的琅岐岛，总面积92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本岛的面积。这里风光绮丽，气候温和，海礁遍布，湿地葱茏，候鸟成群。

当我还是孩提时，爷爷给我讲过闽江口山海经的故事；古时候岛上只有几座山峰屹立在海



宗祠上的“帝世豢龙氏，江都旋马家”楹联

上，岛礁遍布，千姿百态，其形似虎、龟、猴、鸡、犬、猪等，鬼斧神工，惟妙惟肖于云雾缥缈之间，四周海浪翻腾。从宋淳熙年间编写的《三山志》文字记载可知琅岐开辟于唐代。先民依水而居，以海为田，捕鱼蟹为生，勤劳勇敢，生生不息……斗转星移，沧海变桑田。浮海而来的董氏先人，看到如巨龙般翻滚的闽江之水，看到这座绿意葱茏、充满生气和活力的小岛，于是舍舟登岸，择居是地。由此开创了闽江口董氏基业。

“豸龙氏”也因闽江之龙而兴盛发达。居住在闽江右岸琅岐岛和左岸琯头的董氏一族，900年来，人才辈出。

祠内中庭花岗岩盘龙石柱上所刻的27副楹联大多出自历代官宦、名人、书法家之手。其中“衣冠清节传三世，词赋声名著两都”是明朝兵部尚书黄道周手书，说的是董廷钦为官清廉，而且他的词、赋、诗、文名扬天下。

书香世守的琅山董氏受董仲舒儒家文化的影响，历代科甲蝉联，簪缨鹊起，绳绳继继。明朝时董廷钦一门三代连科，祖孙五经博士，父子两广大夫，传为佳话。

宗祠的“怀贤楼”中，陈列着董氏历代先祖画像、传志、家谱、家训、诗词等族史资料，其中就有董应举、董养和等人的手迹。

董应举（1557-1639），字见龙，号崇相，连江县琯头人，曾拜宰相叶向高为师，苦练文笔，辟斋苦读3年，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考中进士。历任广州府教授、南京吏部主事、太常少



宗祠内的功名牌匾

卿、户部侍郎、工部侍郎、两淮盐政等职。万历四十三年（1615），董公辞官返乡，时年59岁。他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闽江边的青芝山，石奇洞幽，被称为百洞山，却因缺少开发，满目荒凉。董公决心要为乡人谋福祉，举全力开发青芝山。在樵夫、牧童的引领下，董应举与众人披荆斩棘，开辟道路，探山寻景，命名题诗。经过几年的辛勤开发，青芝山水大放异彩，吸引了远近游客前来一睹芳容。站在青芝山的山顶俯瞰闽江口，但见浩浩闽江和大海激情相拥，天风海涛，蔚为壮观。青芝寺有副楹联：“紫竹白衣丈室皈依观自在，千岩万壑名山开辟董尚书。”记载了董应举开辟青芝山之功。

董应举一生勤于著述，有《崇相集》四部传世。后人为纪念他，建造了三处祠堂奉祀，这



连江青芝山董公祠

在福建省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这三座祠堂分别是位于连江青芝山的“董公祠”、武夷山八曲涵翠洞的“见龙祠”、朱紫坊的“董见龙祠”。连江百姓建祠供奉他，是因为晚年董公居乡心系桑梓民生，兴修水利置义田，建寨筑堡防外患，救济贫穷建学舍，培养后秀办公益，以及开发青芝山给后人留下一处旅游胜地。武夷山人祭祀他，则是因为他在这里开课讲学，授业解惑，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福州人建祠纪念他，一是喜欢他的诗词，二是钦佩他的治水之道。

宗祠文化底蕴深厚，恰似一部族姓百科全书，浓缩着千年的家族史。人们守护它，不仅是因为一座古建筑，更是守望一种乡愁、传承一种精神。

琅岐董氏一世祖董宗本，其子为董遵海。

董宗本当年是后汉的随州太守，是宋朝皇帝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老朋友。赵弘殷出身将门，然而恰逢朝廷动荡，赵家逐渐衰落，生活举步维艰。赵匡胤为谋取前程，来到随州投靠董宗本。董宗本重义多情，见是老朋友儿子，且相貌堂堂、谈吐不凡，于是收留了他，并安排官职照应。赵匡胤在董府暂住期间，尽管受到董宗本器重，但察觉董遵海对他不屑一顾，自知此地不可久留，于是告别董府。后来，赵匡胤成了大宋朝的开国皇帝，便召见了董遵海。

董遵海原以为难逃一死，主动请罪求死，但赵匡胤不但免了他的罪，还重用他，授予通远军使一职，并想方设法帮他失散多年的母亲从辽国接回团聚。宋太祖不杀之恩，成就了董家几百年名门望族，他们之间的恩怨故事也被董



董宗本



宗祠内的“帝座纶音”匾

家人作为佳话代代相传。

关于宗祠神龛上高悬的那一块金灿灿的明崇祯帝钦赐董养河的“帝座纶音”巨匾来历，民间流传着一段故事。而董养河与兵部尚书黄道周、户部主事叶廷秀所著的《西曹秋思》更是千古绝唱，载入史册，流传至今。

董养河，字叔会，其父董廷钦，明万历七年（1579）举人，历官南京国子监博士、钦州知州、韶州司马、岳州通判、潯州知府等职，著有《剑首吟》诗集。董养河排行老四，他的三位兄长均为举人出身，也都在官府任职，全是文学家、诗人，均有诗集传世。

自幼爱好诗文，9岁便能吟诗作对的董养河，有神童之誉。他少负殊质，入鼓山闭户攻读经史，后又在家乡天竺山罗溪之畔筑室而居，与永福才子黄文焕、鄱正畿，闽县才子林先春为友，经常在一起研究诗文，吟诗作对，留下不少名篇佳句。

当年明工部侍郎董应举，认琅岐董家为自家宗亲，与董养河以叔侄相称。他时常到琅岐探幽览胜，住在董家，见董养河聪颖好学，才华出众，叹曰：“吾家复见一江都郎也！”遂用心教导董养河，使其学业大进。

明崇祯年间，董养河赴京赶考，却因中途染病，贻误考期，流落京城。一日，董养河在饭庄吃饭，恰与微服私访的崇祯皇帝同桌。皇上见他眉清目秀，文质彬彬，却又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似有苦衷。得知他误了考期后，崇祯皇帝十分同情，便试其文才，论及诗文，问之安邦定国之策。董养河满腹经纶，对答如流。爱惜人才的崇祯皇帝便向店家借了文房四宝，写了批信封好，让董养河把信交给主考官即吏部尚书。

董养河虽觉得奇怪，但还是将信将疑地揣着批信去试试运气。主考官见皇上批信，以为董养河是皇亲国戚，果然破例给予补考。考卷送到金銮殿，皇上展卷阅之，见字字珠玑，文采绝伦，



董养河

叹曰：“真是人才，何出晚矣。”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皇上于是挥毫批赐进士，并下旨宣董养河进殿见驾。董养河这时才知道同桌吃饭之人乃崇祯皇帝。皇上见董养河，龙颜大悦，御笔题赐“帝座纶音”四字。就这样，董养河以岁贡被崇祯皇帝特赐进士，授工部司务。

“西曹”是刑部的监狱。董养河因兵部尚书黄道周弹劾杨嗣昌受株连，与黄道周、叶廷秀同关在刑部天牢，三人唱和的诗集，取名《西曹秋思》，诗皆七律，共90首。该书初版推断刊刻于清顺治四年（1647）。

在孤本《西曹秋思》的卷首，可看到董养河小儿子、广东惠州府河源知县董师吉撰写的一篇刻书前记。董师吉在“前记”中说其父董养河病逝于崇祯十六年（1643）秋，他刊刻此书“前记”时，“作令赴粤，怆然数载之中，岸谷陞沈，而先大夫又弃予五年所矣”。董师吉“作令赴粤”的具体地点，据其“前记”所署，为广东惠州。

这部《西曹秋思》写作的大背景是晚明时期，社会种种矛盾日益尖锐，就像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此时的朱家帝国已是穷途末路，气息奄奄。特别是崇祯皇帝刚愎自用，满腹猜忌，直至

葬送了大明江山，还把罪过都推给臣下，笃信自己不是亡国之君。面对颓败的政局，董养河、黄道周等东林党人，奔走呼号，试图重振朝纲，直接导致被捕入狱。

一部《西曹秋思》，让人们想见当年黄道周、董养河、叶廷秀铁骨铮铮的风采，虽身处狱中，仍彼此唱和，互相鼓励，意图通过诗歌，倾吐心声，抒发忧国忧民情怀。整本诗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光阴荏苒，无论世界怎么改变，不管有多么新奇的文化传播方式出现，但我依然相信，文字的功能，还是具有最强大、最深刻、最能丰富我们的思想，最能体现生命本质的力量。

董氏宗祠记录了琅岐董氏的家族历史，而那些从闽江口走出去的后人，即便在异域他乡，仍然坚守着、传承着那份乡愁与执念；每逢清明节、重阳节、春节，董氏后裔包括台湾的不少宗亲都会来到琅岐寻根访祖。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闽江口的董家续写着家族的历史与辉煌，董公祠庇护着子孙的现在与未来。魂萦梦绕的故乡，无论我们相隔多远，无论历经多少岁月的沧桑，只要家国情怀在，心就在，根就在。



翠旗谷口万松风

文 净

旗山脚下的南屿，北临乌龙江，南傍大樟溪。这片流水冲积而成的平野之上，还有一道溪流迤邐而过。那溪流源自旗山，当地人称为锦溪。“溪水明于锦，层波映不穷”。明代尚书曹学佺的诗句，便是这一得名的生动诠释。早年的锦溪水质极佳，盛产溪蚬，人亦称之为蚬溪。而溪



打捞前，被用作码头和浣衣石的旗杆碇

中出产的赤鲤，更是绝美溪鲜，把它与当地所产的笋丝同烹，人称南屿一绝。

2019年11月5日，一辆大型挖掘机与一辆大吊车开到锦溪畔。当吊车的长臂向溪底伸去时，人们看到，先后从水里捞上来12块古代旗杆碇。12块旗杆碇，正好拼成六合，可竖立6根旗杆。村里老辈人都记得，旗杆当年就分别竖立在明代进士林春泽与林应亮的居所前。

明正德九年（1514），南屿人林春泽高中进士。初任户部主事，后履职于甘肃宁州、江西吉州、广东肇庆、贵州程蕃等地，官至知府。从林春泽始，锦溪边的林氏家族科第连绵。嘉靖十一年（1532），林春泽之子林应亮得中进士，先后在浙江、湖南、广西、广东等地任知县、知府、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后升为户部右侍郎。嘉靖四十四年（1565），林春泽之孙林如楚也进士及第，先后在南京、广东等地任职，后升至工部右侍郎。明崇祯十三年（1640），林如楚之孙亦高中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兼广东布政司参政。一门五代四进士，一时传为佳话。

南屿以锦溪为界，分南北两屿。林春泽中进士之前，他的家乡还称为北屿。当年，与林春泽得中同科进士的还有福州林浦的林炫同，后两人又同朝为官。某日早朝，皇帝呼“林卿家”，两人竟一同应声趋前。为免于混淆，皇帝按林浦居东、北屿居西的方位，称林炫同为东林卿家，林春泽为西林卿家。此后，北屿人便改村名为水西林。水，指的就是流过村前的锦溪。绵延不绝的锦溪水也寄寓着他们对家族文运昌盛、福泽绵长的期盼。

一个村庄的名字，因一个人而改变。随之被改变的，还有村庄的面貌。明嘉靖五年（1526），林春泽与其弟林春育在故居旧址建碧山堂。9年后又大兴土木，建成占地达4200平方米的8座民居。八字马头墙，穿斗木结构，门前左右抱鼓石，门楣上方置簪缨，梁桁下雕镂空枋，窗扇内花格图案。郭子仪拜寿、三世宴琼林

的故事绘于墙上。数百年过去，这些房子已布满岁月斑痕，有些构件已变形、朽坏甚至消失，但人们依然能从尚存的建筑体中，体味到官宦世家的考究与书香门第的风雅。此后，这里又陆续兴建或重修了狮岩林公祠、水西林氏宗祠、旗峰林公祠、次峰林支祠、人瑞堂，与其他建筑一道，形成长约百米的水西林一条街。在南屿被列为福州开发区的今天，这条古街还是被精心保护起来，并将通过修复改造，成为供人游览的特色文化街区。

二

穿行在水西林古街，也许有人会冒出这样的疑问：虽说数代高官，薪俸不薄，但仅凭那些银两，能盖起那样的一片“豪宅”吗？

在京城任户部主事时，林春泽负责管理通



林春泽故居



林春泽故居檐角的“郭子仪拜寿”壁画



林春泽

州仓场和临清关税务。临清关被视为北京门户，多少商旅来往于此，林春泽若想从中搜刮，只要稍稍使点脸色，自有银两奉送，可他所采取的措施，却是“宽征疏滞，商旅便行”。边关商贸繁荣了，国家赋税收入增加了，他的个人腰包却没有随着这一肥缺鼓胀起来。此后他升任户部员外郎，负责管理运河北部漕运，想捞点油水，更是易如反掌。他却致力于清除欺诈百姓弊习，并应民之所呼，及时疏浚河道阻塞。上任当年，即完成漕运疏通，来往船只畅行无阻。民感其德，呼之“林佛”。

林春泽最“犯傻”的一件事，便是上书劝阻皇帝南巡。正德十四年（1519），29岁的正德帝意欲出宫南巡，朝中百余名官员群起跪谏，龙颜震怒，这些官员各挨廷杖30下，并罚跪午门五天五夜。廷杖之下，11名官员当场死亡或伤发而死。见此情景，朝中官员谁敢再谏？林春泽当时并不在场，获悉后竟上疏千言，为同僚申辩曲

直。结果，他成了又一个挨廷杖的官员。

那次廷杖事件之后，林春泽被谪贬，先后辗转于数省的偏远之地。任广东肇庆同知时，高州遭盗寇劫掠，朝廷命林春泽代理高州知府事。林春泽放着已有的官兵旧部不用，竟将他们悉数遣送，另组土著武装前往平寇。平靖盗寇，需要百姓的配合支持，失去民心的官兵，能有几分胜算？然而，放弃旧部的战斗力，无疑会得罪诸多同僚甚至上司，另组土著武装，自然也要冒很大风险。如果输了，必会遭到多方诋毁。林春泽不计个人进退得失，大胆推进既定的平寇方案，终获胜利。盗寇被平，谤声暂息，但他的这种刚直性格，仍给未来的仕途埋下隐患。任贵州程蕃知府时，林春泽致力于选贤才，兴教育，平匪寇，重民生，却招致庸劣之辈的妒忌中伤，终被朝廷予以“候调遣归”。

林春泽之子林应亮，亦以刚直著称。在常德知府任上，面对地多蛮峒、民生困苦之状，林



林应亮故居



水西林古街

应亮寝食难安。得知当地荣王府官校仗势欺压百姓，林应亮排除干扰，按律执法，核定兵饷，清理邮传，削减不必要开支，并果断惩治不法官吏和兵校，保障百姓安居乐业。其治政之胆识，赢得百姓称誉，亦令曾经不可一世的“地头蛇”荣王慑服，转而配合林应亮施政治境，约束其部下的不法行为。尤为可贵的是，大奸相严嵩任礼部尚书时，林应亮就与他相熟。严嵩炙手可热之时，林应亮并未有任何特别讨好的举动，甚至当场对严嵩用人不当的做法表示反对。那一回，严嵩欲派户部一位官员赴蓟州督饷、练兵，林应亮据理发问：“督饷者，督京运乎？民运乎？若二运已有职掌，添官徒增扰耳，兵之不练，其过不在是，即户部侍郎出，何益？”严嵩无言以对，遂罢其议。林应亮的不套近乎，本就令他不快，如此不给面子，更令他怒火中烧。事后，严嵩指使

亲信参劾林应亮，林应亮调职南京。林应亮对黑暗官场深感失望，便以父老为由，力请归乡。

林春泽父子分别与大奸臣刘瑾、严嵩同朝，在丑陋不堪的明代官场，他们如故乡的锦溪水一样不随浊流，坚守清廉。水西林的乡亲们都知道，他们在故乡所盖的楼房，大部分资金来自林春泽的同父异母弟弟林春育，他是当地有名的富商。凭借王阳明巡抚南赣汀漳时的平乱剿匪之功，那时的闽赣商路已无匪盗之患，林春育从江西购粮运至福建出售，并以粮酿酒，兼营酱园。当时名闻南屿的“五和酒店”和“林记酱园店”，均为林春育所开。嘉靖十四年（1535），林春泽见后楼的祖房已破旧欲倾，遂有拆旧建新之意。与林春育商量建房事宜时，腰缠万贯的林春育想到哥哥当官数十年，侄子亦当朝为官，一家人名声在外，却没有几间好房子，便主张大部分由他

出资，兄弟合力盖几幢大屋。

三

旗山别名翠旗山，起于闽侯上街溪源里，止于南屿水西林。水西林的确切位置，位于发轫于旗山的太平山东麓。今天，在太平山西麓的闽侯三中校园，人们还能看到一片杆粗枝繁的杜松林。那是林春泽当年牵头栽植的。

村里的老辈人说，这片树林的山地原来不是林氏家族的。林春泽当官后，花银两购置它。在这里植树，能挡风挡雨，防止水土流失。树身挺直、木质坚实、耐水抗旱、生命力强的杜松，似乎也寄寓着林春泽为官做人的精神取向。

林春泽“候调遣归”之后，亦生归乡养老之意。那时他还不到60岁，时人说他“方壮而力辞于未及之年，才有余而退托不能而止”。他有着深厚的故土情结，家乡的青山绿水、良田美溪，



闽侯三中校园内的杜松林

不时梦中萦绕。更何况已备尝仕途之坎坷，对自己的升降进退，并不会像某些利禄之徒那般耿耿介怀。

告老返乡之后，林春泽在太平山上筑锦溪草堂。太平山，亦名使亭山。“回视峰山之下，诸山逶迤而下，皆如瓜、如匏，而此山之巔坦然如砥，自来不遭兵灾，谓为太平山亦宜。”林春泽所作《使亭山记》，道出他选择此山作为老来养心地之缘由。想必他最爱的是那“坦然如砥”的山巔，那也是他孤高与坦荡心境的自然写照。

在太平山，林春泽时与当地名士谈古论今，吟诗作赋。客去人散时，常常以书做伴，静心著述，整理旧作。《荃蒂》4卷，《人瑞翁集》12卷，《家训》16篇，便是他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

林春泽在太平山上的建筑，不只是一座锦溪草堂，那里还有“竹斋”与“茂对亭”。山上胜景甚多，林春泽闲步其间，见有佳妙之处，便为之起个雅名。于是，太平山便有了内八景与外八景。内八景为：峨弁石、聚奎石、出云峰、三岛峰、梯云径、五云岗、迁莺林、团柏坞。外八景为：攀萝蹬、鸿渐盘、丹桂崖、烟翠洞、石筠亭、双玉碣、仙碁石、撷芳崖。这些美丽雅致的名字，也让我们窥见一位退休老人特别丰盈的内心世界。

林春泽的足迹并不止于太平山。时人说他身体矫健，至暮年亦精神矍铄。故乡周围的好山好水，不时诱发他的游兴。登旗山，他还留下散文佳作《旗山记》。去溪源宫，便有了律诗《夜游



林春泽手书“翠旗衍秀”牌匾



水西林氏宗祠内的“三世重宴琼林”牌匾

溪源宫》。

水西林街林公祠的正殿，有一块高悬于梁的明代木匾，上书“翠旗衍秀”，那是林春泽 83 岁时的手迹。四个行楷大字端秀大气，笔力稳健。可以想见，已入暮年的林春泽，朗骨丰神犹在。

对林春泽来说，83 岁也许还不是他的暮年，他和妻子都活到 104 岁。幽美的风光，新鲜的空气，山货、水产、稻薯、果蔬俱备的一方水土，使这里成为闻名的“人瑞境”。古时年逾百岁的老人被称为人瑞，可见那时的南屿是个长寿之乡。

嘉靖四十四年（1565），85 岁的林春泽迎来家族的高光时刻。那年，他的孙子林如楚高中进士，皇帝为新科进士举行琼林宴，也邀请林春泽重宴琼林，林应亮其时在京都任高官，自然也要赴宴作陪。虽然林春泽因路途遥远无法赴京，但能获得邀请，便是一份难得的殊荣。三代进士已颇引人瞩目，三世同宴琼林更是世所罕见。那面“三世重宴琼林”的牌匾，至今还高挂在家族的祠堂里。

林春泽一生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

隆庆、万历六朝，人称六朝大老。百岁高龄时，万历帝颁旨为他建百岁坊。林春泽欣悦之余，赋诗一首。“翠旗谷口万松风，喘息犹存一老翁。”诗的开头，林春泽以旗山上的浩浩松风，反衬自己“喘息犹存”的老境，读来有些黯然。然而，诗句的意蕴似不尽于此。旗山多松，万松之林迎风呼啸，荡动着亘古不变的正风与清风。家山的松林与松风，也是他立身处世的一股精神泉源。

太平山麓的 200 棵手栽杜松，此刻也已成林。虽然旗山上长的是马尾松，这里种的是杜松，但它们都属松科，也有着相近的特征与品格。“万松”与“百松”上下呼应，在水西林上空频频交响。对林春泽来说，那是陪伴他晚年最悦耳的声音。

四

林应亮、林如楚致仕后都归乡养老。与林春泽一样，他们也喜欢伴着家乡的松风溪韵，静静地读书写作，而且都有诗文集存世。林应亮著



林应亮故居内的《耕织图》壁画

《少峰草堂诗集》，林如楚著《碧麓堂诗文集》16卷。

水西林系唐九牧林后代。宋初，始祖林敬德举家从福州榕屿迁居至此。在宋代，北屿林氏就以科考登第名闻榕郡，林畊“父子八进士”更是传为佳话。据载，水西林科甲最鼎盛、入仕者最多的时期，在宋、明两朝。元、清两朝，水西林氏抱“不食周粟”之气节，耻于应考为官。林如楚之孙林慎在明崇祯年代官居高位，明亡后被清廷留用，回乡祭祖时竟无族人捧场。遭此冷落，林慎自觉无颜，只好举家迁往广东。

林春泽旧宅的最深处，有座玉音楼。民间传说，那是清代林家小姐瑞玉的闺房。林瑞玉当年随父赴京游学，与乾隆六皇子相恋，碍于满汉不通婚，只得郁郁而归，后病逝于此。传说《红楼梦》的宝玉黛玉相恋，就是以此为素材的。说是林瑞玉离京之时，皇太子还赠她一副木刻楹联。细看至今还保存的那副楹联，落款虽为六皇子永瑆，但所赠者却另有他人，联句内容亦与男女情事无关。据此引发出一段男痴女怨的爱情故事，

应该是口头文学家们的凭空想象吧。真正发生在玉音楼的故事，倒是与一位男人有关。他是林慎的堂弟林系。清兵入关后，林系决意不事二主，居玉音楼20年，身不下楼，头不剃发，以示不顶清朝天，不踏清朝地。在玉音楼上，林系著《耕稼集》11卷，并绘《耕织图》两幅，请人临摹于墙，告诫子孙后代以耕织为本，不入清朝官场。

20年身不下楼头不剃发，或许有些夸饰，但不入清朝仕途，水西林的子孙大多做到了。官可以不做，日子总得继续。良田青山，可供耕樵；水陆通道，便于商贾。丰富的原产食材，又使这里成为厨师的摇篮。弃儒经商后又改行当厨师的林学榕，用地产笋丝为配料烹制草鱼，首创“凤尾草”名菜。其再传弟子林文挺则是福州聚春园的头牌厨师，尤擅“杂烩汤”，普普通通的几种食材，经他妙手点化，竟成为聚春园的一道招牌菜。

直至20世纪50年代，水西林太平山麓的那片杜松林还是200棵。蔚然成林的杜松，引众多白鹭前来搭窝筑巢。夕暮时分，白鹭归林，远远望去，点点如雪花飘扬，人称“杜林飘雪”。从福州搭船过渡的南屿人，在湾边码头就能看到这样的奇观。在他们心头，那是故乡的地标。那片松林所荡起的正气与清风，也给水西林的子孙们以无尽的精神滋养。

闽系海军的形成和发展

高 熔

闽系海军源于北洋海军，辛亥革命后，海军在军阀割据时代，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闽系海军也于此时正式形成并得到发展。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对海军分而治之，遂有闽系、青岛系、粤系、电雷系海军之称。因此，叙述闽系海军的历史，需从北洋海军说起。

中国近代海军的产生

清朝原只有旧式水师，没有近代化的新式海军。水师有外海与内河之分，外海水师用于“防守海口、缉捕海盗”，内河水师用于巡防内河各港



左宗棠上疏清朝关于设立福州船政局的奏折

口。

两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使清政府备受凌辱，两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因此，建立一支用现代军舰大炮武装起来的近代海军，就成了清政府的当务之急。中国要自强非利用西洋利器不可，这就是当时洋务派“师夷长技”的主张。

清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上疏建议设立福州船政局，开厂造船。同年八月，福州船政局成立，聘请原宁波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和法国洋枪队将领德克碑，并雇用 37 名法国技师监造轮船。从同治八年（1869）到光绪二十年（1894）的 25 年间，福州船政局共建造了舰船“万年清”“永保”“琛航”“大雅”“康济”等 33 艘。

为了培养海军驾驶、制造人才，左宗棠又疏奏在船政局附设艺局，招收生员学习管驾、制造。

清同治末年（1874），针对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台湾高山族人杀害，出兵 3000 侵略台湾这一事件，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了《海军水师章程》六条，建议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北

洋海军负责山东、直隶洋面，设提督于天津；东洋海军负责浙江、江苏海面，设提督于吴淞；南洋海军负责广东、福建海面，设提督于南澳。

清光绪五年（1879），福建海军初步建立，拥有巡洋舰“扬武”、炮舰“伏波”“济安”、运输舰“永保”“琛航”等共11艘，负责巡守闽江海口和台湾、厦门以及琼廉海面。光绪十年（1884），南洋海军初步建立，拥有巡洋舰“开济”“镜清”“南琛”“南瑞”、炮舰“横海”“元凯”“澄庆”等共18艘，分驻江宁、吴淞、浙江等地，负责江苏、浙江海面。在建立南洋海军之先，北洋海军已初步建立，拥有巡洋舰“超勇”、练习舰“康济”、通报舰“泰安”、运输舰“操江”、炮舰“镇东”“镇西”等共14艘，分驻大沽、旅顺、营口、烟台，负责巡防奉天、肖隶、山东海面。

闽系海军的形成

清光绪五年（1879），两江总督沈葆楨去世，海军的实权落在李鸿章手中。李鸿章最初倾

向于自己造舰，后鉴于日本入侵台湾，被逼转而主张在外国订造铁甲军舰。陆续订造铁甲舰“定远”“镇远”（7335吨级）2艘，新式巡洋舰“致远”“靖远”（2300吨级）和“经远”“来远”（2900吨级）以及“平远”（2300吨级）5艘，鱼雷艇“福龙”“左一”“左二”“左三”“右一”“右三”“右三”7艘。

清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海军正式成立。

北洋海军的高级军官多闽人，辅佐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组织训练海军、订立海军规程的都是福州人如刘步蟾、林泰曾等。

清同治六年（1867），前江西巡抚沈葆楨（福州人）继左宗棠总理福州船政后，所设的福州船政局前后学堂开始在福州地区招生。另从广东招收会英文的学生张成、吕瀚、邓世昌等10人。这批福州、广东学生就成了中国近代海军的第一批人才。

清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从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一、二届优秀毕业生中遴选出罗丰禄、黄建、蒋超英、林永升、叶祖珪、林泰曾、萨镇冰、刘步蟾、林颖启、方伯



1870年前后，福建船政全景



船政后学堂一期驾驶班合影

谦、何心川，严宗光（严复）、江懋祉等人出洋学习。他们都是闽侯籍。

清光绪七年（1881）、十二年（1886）、十七年（1891），清政府又续派三届学生出洋学习。

出洋留学，决定了他们在海军中的升迁。所以李鸿章后来在组建北洋海军时，“所需管驾，大副、二副、管理轮机炮位人员，皆借材于闽省。”

光绪六年（1880），筹建北洋海军的前夕，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询及左右，问当时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船统带邱宝仁（闽）、邓世昌（粤）、刘步蟾（闽）、林泰曾（闽）四人相较如何。得出的结论是刘步蟾最优。曾任过福建巡抚的丁日昌则评：“张成（粤）近执，吕翰（粤）近猾，刘步蟾近粗，林泰曾近柔，蒋超英较为纯粹，而年过轻。”

清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舰队正式成军时，林泰曾、刘步蟾被授予左、右翼总兵。

因水师提督丁汝昌出身陆军，不谙海战，

因此，刘步蟾实际上掌握了北洋舰队的管理、训练、指挥战斗实权，《北洋海军章程》的“一切规划，多出其手”。

清廷腐败，海军连战皆北

光绪十年（1884），法政府派海军强行进入马江，企图一举摧毁福建水师和马尾造船厂。战争爆发前，清政府既不调遣南、北洋海军赴援，又不认真做好战争准备，具体负责战争防御的福建地方官员则颡顽无能。因此，在法国海军的突袭下，不到1小时，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舰艇“扬武”“济安”“艺新”等11艘被击毁击沉。“飞云”管带高腾云（粤）和马尾船政学堂毕业生、“振威”管带许寿山（闽）、“福星”管带陈英（闽）、“福胜”管带叶琛（闽）、“建胜”管带吕翰（粤）、“福胜”大副翁守恭（闽）等2000多名官兵以身殉国，马尾造船厂也受到重创。

早在清光绪十七年（1891），北洋海军右翼



马江海战中受到重创的马尾造船厂

总兵刘步蟾鉴于朝鲜半岛纷争频起，日本有侵略扩张，觊觎朝鲜、挑衅中国之意，而我国海军军舰的战斗力的远逊日本，舰上特别缺少新式速射炮，就屡向提督丁汝昌提议，丁汝昌也据以上陈，要求续购新舰，更换旧式大炮。但由于各省解部充海军军饷的银两被慈禧太后挪去修建颐和园，所以，迟至1894年“定远”“镇远”二舰才换上速射炮12尊。这导致北洋海军在1894年的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吃了苦头。

黄海大东沟海战，北洋海军损失了“致远”“经远”“超勇”“扬威”4舰。壮烈殉国的有：管带邓世昌（粤）、林永升（闽）、黄建勋（闽）、林履中（闽）、帮带大副陈金揆（苏）、陈策（粤）、翁守瑜（闽）、郑文超（闽）等800多名官兵。日本舰队的“松岛”“比睿”“赤城”“西京丸”4舰中弹累累，“吉野”“浪速”2舰也受重创，使日方暂时失去了第二次与北洋舰队在海上决战的能力。

但是，清政府对战争已完全失去信心，李鸿章多次压制丁汝昌、刘步蟾等人的请战，指示丁汝昌设法避战保船。这样，当“松岛”“比睿”2

舰修好归队时，日军采取从陆上包抄后路的战术，于1895年1月25日起，向停泊在威海卫刘公岛的北洋舰队发起总攻击。

鱼雷艇“左一”“福龙”等13艘在管带王平（天津）、蔡廷干（粤）率领下出逃（除“左一”逃回天津外，其余皆被日舰击沉），“来远”“威远”被击沉，“定远”“靖远”被击伤后搁浅。为了不让其落入敌手，丁汝昌、刘步蟾下令自毁炸沉。丁汝昌（皖）、刘步蟾（闽）、杨用霖（闽）等人自杀。叶祖珪（闽）等人在总教习、英人马格禄，英人泰莱，陆军教习、德人瑞乃尔，北洋海军威海营务处提调、道员牛昶昞等人胁迫下，于2月12日投降。至此，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甲午战后的海军

中日甲午战争后，北洋水师管带叶祖珪（闽）、邱宝仁（闽）、李春庭、林颖启（闽）、萨镇冰（闽）等官兵3000多人被罢遣。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势力日益猖狂，企图瓜分中国。从1894年至1898年，清政府向英、德、日等国订购炮舰“福安”、鱼雷艇“辰”字、驱逐舰“雷霆”等14艘。

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八日，清政府起用叶祖珪为提督衔补用总兵、北洋水师统领，萨镇冰为总兵衔补用参将、北洋水师帮统领，统领时购得“海容”“海筹”“海琛”及鱼雷艇等。同年，“海天”“海圻”2舰到华，叶祖珪兼“海天”

舰管带、萨镇冰兼“海圻”舰管带。

此时北洋水师几艘主要军舰的舰长分别如下。“海天”：叶祖珪（闽），同年由刘冠雄（闽）接任；“海圻”：萨镇冰（闽）；“海容”：林颖启（闽）；“海筹”：李鼎新（闽）；“海琛”：李和（粤）。

1900年6月17日，日、英、法、俄、德、奥、意、美八国联军进攻大沽口炮台，守将罗荣光率爱国官兵奋勇迎战，击伤敌舰十余艘后，因弹尽援绝，大都壮烈牺牲。“海容”舰在港口内坐困，萨镇冰所率兵舰在原地无法赴援。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议和大臣竟欲自行解除仅存的几艘军舰，将“海天”“海圻”“海容”“海筹”“海琛”5舰退还英、德两国。此事受到以叶祖珪为首的海军将领的坚决反对。同年，叶祖珪奉直隶总督之命，向俄使接收被占用的大沽船坞。

1904年，南洋大臣以南洋水师亟待整顿，请准以叶祖珪为广东水师提督，督办南洋水师学堂及上海船坞。萨镇冰则升为广东南澳镇总兵官，统带北洋水师。

1905年夏，叶祖珪在巡视沿海炮台及水雷营地时，因劳累中暑，又染上伤寒，病逝于上海。清政府遂任命萨镇冰为广东水师提督，并总理南北洋水师。

1899年至1909年间，清政府向日、德订购“楚泰”“楚同”“楚豫”炮舰，及“湖鹏”“湖鹗”“湖鹰”“湖隼”等鱼雷艇。



萨镇冰

1909年，清政府迫于压力，宣布预备立宪。7月15日，派郡主衔贝勒载洵和萨镇冰为筹备海军大臣，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萨镇冰将南北洋海军收归统一，将大小舰艇40多艘分为巡洋、长江两舰队。其中巡洋舰队以“海圻”“海容”“海筹”“海天”4艘巡洋舰为主，长江舰队以“四江六楚”炮舰为主。1910年10月，清政府把筹办海军事务处改为海军部，任命载洵为海军大臣，谭学衡为海军副大臣，萨镇冰为巡洋长江舰队统制。

当时海军部及各舰要职各单位中，闽籍占一半多。

1904年，“海天”巡洋舰管带刘冠雄因兼程赶路，航至吴淞口外海面，适逢大雾，触碰于鼎新岛，经救援无效而折废，刘冠雄受撤职处分。

辛亥革命时期的海军

辛亥武昌起义时，湖北总督瑞澂逃至泊于武

昌城外的“楚豫”炮舰，乘舰下九江。朝廷命陆军大臣荫昌率陆军南下，讨伐革命军。命海军统领萨镇冰及长江舰队统帅沈寿堃率巡洋、长江二舰队援鄂。

这时，巡洋舰“海圻”由巡洋舰队统制程光璧率领赴英，参加英皇加冕典礼未回。

萨镇冰乘“楚有”炮舰于10月17日到汉口，沈寿堃已率长江舰队的其他各舰先到汉口，向萨镇冰报告“建威”炮舰大副朱孝先（苏）及郑礼庆两人同情革命，已投向黎元洪。翌日，萨镇冰率舰前往青山方向侦察，遭革命军炮击，萨镇冰用旗号指挥各舰还击，两军交战约1小时。10月26日，海军各舰开至造纸厂江岸，猛击革命军阵地，击伤击毙革命军数百名，使清陆军得以通过三道桥隘路，占领造纸厂。后又率“海容”等兵舰3艘，突过革命军防线，击毁车站围墙，清军进攻得手。

萨镇冰到汉口后，投入革命军的朱孝先奉革命军都督黎元洪之命给萨镇冰送来一封信。黎元洪本是北洋水师学堂学生，曾参与甲午中日海战，后加入陆军。黎元洪称萨镇冰为老师，信说清廷无道，武昌军民万众一心，立誓推倒君主，建立共和，请老师共举义旗。萨镇冰阅后默默无语。黎元洪又派一个叫轲斯（瑞典人）的红十字会会员送来意思大致相同的信。

于是，萨镇冰于翌日下午1时，令各舰都派舢板一艘，由“海容”舰的小火轮拖带驶往汉阳，向汉阳开炮，然后解绳转舵驶回本舰。各舢



“海容”号巡洋舰

板亦向汉阳开排枪后，即转舵下驶。

此时，长江下游各处纷纷响应起义，海军的中下级军官也多倾向革命。于是，“海容”舰大副饶涵昌（闽）、陈季良（闽）等与“海琛”船员联系，先说服“海容”“海琛”管带起义。另外，萨镇冰的副官汤芑铭（鄂）也联络了“江贞”管带杜锡珪（闽），一再劝萨镇冰起义，顺应潮流，为革命立功。最后，萨镇冰同意把舰队调赴九江。

此后，鄂军政府任命吴应科（粤）为海军总司令官，黄钟瑛（闽）为海军司令部长。而海军各舰以汤芑铭（鄂）说服萨镇冰离舰而使海军能参加辛亥革命有功，故公推他为临时海军司令。

是年11月21日，汤芑铭率“海容”“海琛”等舰到武昌，炮打二道桥和三道桥，阻断清军的铁道联络，并协助青山岸上民军乘船攻打二桥。汤芑铭还带领“海容”“海琛”两舰及“湖鹞”鱼雷艇溯江而上，在汉江口外与清军设在江岸的大炮激战2小时，打死打伤清军第四镇士兵400多人。以后，“海容”等舰又梭巡于汉江口外，不



黄钟瑛

断炮击二道桥、三道桥的清军炮垒，协助革命军防御。

革命军光复上海后，停泊在高昌庙和杨树浦的“建安”“楚有”“飞鲸”“策电”炮舰，“登瀛洲”运输舰，“湖鹏”及“辰”“宿”“列”等鱼雷艇均悬挂白旗，归顺革命军。

在镇江江面处，有南洋海军统领宋文翔（粤）的兵舰12艘。都督林述庆（闽）于11月7日在镇江独立后，即派广东人许崇灏到舰劝宋文翔归顺革命军，宋文翔（兼“镜清”舰舰长）首先服从，“楚观”舰舰长吴振南（粤）也表示同意。其他舰长多系闽籍，且多姓林，与林述庆有同乡同宗之谊，故一致赞同。举义旗归顺革命。宋文翔被任命为海军司令，吴振南被任命为镇江都督府海军处长。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钟瑛任海军部长，汤芑铭任海军部次长兼北伐海军司令。汤芑铭率“海容”（舰长杜锡珪，闽籍）、“海琛”（舰长林建章，闽籍）、“海筹”（舰长

颂庄，闽籍）、“通济”（舰长葛宝炎）等舰由南京出发，经上海往烟台。

舰队停泊在烟台，直到南北议和成功。

袁世凯时期的海军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出任大总统，任命刘冠雄为海军总长。刘冠雄在海军中的资历仅次于萨镇冰、蓝建枢、李鼎新三人，北洋海军中萨镇冰、蓝建枢、李鼎新为游击（少佐），刘冠雄为都司（上尉）。且刘在1904年管带“海天”巡洋舰触礁沉没，按清律当处极刑，多亏沈瑜庆（沈葆楨之子）竭力为其奔走，后由北洋大臣袁世凯奏保，获准免罪，革职了事。因此，刘冠雄感袁世凯恩，投于袁世凯门下，任德州机器厂总办。此次袁世凯任命刘冠雄为海军总长，试图通过刘冠雄掌控海军，以利称帝。

刘冠雄接手海军部后，即接收各地海军机构，集权于中央。除海军部次长汤芑铭、军法司司长许继祥、军需司司长林葆纶外，总纂令部员严复以下皆闽人，主要舰艇长、造船所所长、船政局长、海军军官学校校长以及主要职员皆闽人。

同年12月4日，黄钟瑛积劳成疾，卒于沪寓。继任的是刘冠雄的同学李鼎新（闽）。

1913年，二次革命起，海军部次长汤芑铭奉命率各舰赴湖口镇镇压讨袁军。

7月18日，汤芑铭率“建安”“飞霆”“楚同”“江利”“湖鄂”五舰艇至湖口协助陆军攻

击东西炮台，26日克复湖口。刘冠雄则率本队协助李厚基的陆军第七旅，于8月13日进攻收复国民党人居正占领的吴淞炮台，协助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刘冠雄因功兼任南洋巡阅使，后兼福建都督。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建号洪宪。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率先反对，宣布独立，组成护国军讨袁。

南方革命党人以陈其美为首，在上海活动期间，强夺驻泊在高昌庙的“肇和”舰。独少校副官陈绍宽（闽）在部值日，闻讯即下令驻泊在港的“海琛”“应瑞”等舰炮击，夺回“肇和”舰。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孙中山、黄兴等人通电反对，要求恢复旧约法。在全国一致反对新约法的呼声中，段祺瑞却于6月23日发出漾电，反对恢复旧约法。6月25日，已被撤职的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率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闽）联合发表宣言，为拥护旧约法而宣告独立。海军这一行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段祺瑞被迫改变主张。北京政府于6月29日宣布恢复旧约法，并定于8月1日召集国会复会。李鼎新、林葆懌、曾兆麟等人宣布率舰回军。

于是，刘冠雄辞去海军总长职，由程璧光（粤）继任。

军阀混战时代，各派系都培植力量，作为政治资本。故不但在刘冠雄当权时期，海军部各司及主要舰艇长都用闽人，连马尾各校也不对外公

开招生。

清朝时期全国规模较大的海军学校有：①沈葆楨创办的马尾船政学堂，多收福州人。后来学堂改为海军学校，该校历届校长为王桐、朱天森，杜锡珪、李孟斌、沈笏玉、高宪中，除朱天森外，其余全是闽人。②李鸿章于光绪六年（1880）创办天津水师学堂。严复（闽）为总教习，后升为天津水师学堂总办。这一学堂也多收闽籍学生。如1898年海军统领叶祖珪回闽巡视沿海炮台时，严复就托其到榕代选30名15岁左右的优秀子弟，以备考水师学堂。这30名子弟全被录用。③张之洞于1887年创办广东水师学堂时，第一届除从原“博学馆”旧生中录取40名外，其余录用的就是从福建调去的闽籍学生50名。此外，任水师学堂总办的林贺峒（林则徐之孙）、魏瀚都是闽人。④曾国荃于1890年创办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第一任总教习就是闽人蒋超英。⑤萨镇冰于1903年底在烟台创办的烟台海军学校，由海军练营管带谢葆璋（闽）兼理校务，历任校长有谢葆璋、郑汝成、蒋拯、郑祖彝，也都是闽人。烟台海军学校所招学生，因有地区名额限制，故闽人投考此校时多报外省籍，如“通济”舰舰长严寿华（闽）投考时报河南籍。后来担任海军要职的，如海军部常务次长李世甲（闽）、厦门要港司令刘德浦（闽）、海军陆战队旅长杨砥中（闽），都是烟台海校的毕业生。

如上所述，闽系海军的形成与发展，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海军宿将刘冠雄

方百年

刘冠雄的父亲是一个箍桶匠，家境贫寒。他的5个儿子中，除第4子早丧外，其他4个后来都在海军中任职。刘冠雄是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官位最高的一个。他在少年时考入了设在马尾的船政学堂，是驾驶班第四期学生，完成了为期三年半的堂课学习和近两年的海上实习后顺利毕业，被派往北洋海军成为见习军官。1885年底，清政府选派第三批海军留学生前往英国、法国学习，其中驾驶专业17名，从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的毕业生中挑选，刘冠雄即为其中一员。

1886年4月6日，刘冠雄等33名海军留学生从香港启程，前往法国。邮轮于5月5日到达法国马赛。14名制造专业的学生留在法国就学，刘冠雄等17名驾驶专业和2名轮管专业的学生则前往英国。抵达英国后，刘冠雄等8人奉派“学习操放大炮枪队阵图大副等兼驾驶铁甲兵船”。



刘冠雄

是年10月，刘冠雄与黄鸣球、邱志范三人被派往英国军舰“额格士塞兰德”号学习炮术。第二年6月，他们转入武力士炮厂，学习制造枪炮和火药等。

1887年，清政府派员前往英国、德国接收订购的4艘新式巡洋舰：“致远”“靖远”“经远”和“来远”。北洋海军派出最优秀的官兵参加这次接舰行动，4舰各配备管驾官1人、大副1人、留学生2人。4位管驾官是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与邱宝仁，除邓世昌外，其他三人都曾在英国留学。

正在留学的刘冠雄，也被特招参加了接舰工作。他是17名正在学驾驶的留学生中唯一一位被特招参加接舰任务的，被安排在“靖远”号巡洋舰上担任大副。接舰官兵的职责参照英国海军的有关规定执行，大副的职责是管理“船内事宜”，“凡舟之行止，人之功过皆主之”，责任重大。1887年9月，“致远”“靖远”等4艘巡洋舰和在英国订造的“左队一号”鱼雷艇，从英国朴次茅斯港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航行于年底顺利回国。刘冠雄就此结束了他的留学生活。

1888年4月，“靖远”等4艘巡洋舰和“左队一号”鱼雷艇驶抵天津大沽，加入了北洋海军。此后，刘冠雄便留在“靖远”舰上任帮统等职。是年8月，台湾吕家望番社围攻设在卑南的清军大营，台湾巡抚刘铭传请求援助。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靖远”“致远”两舰赶往台湾。抵达卑南后，刘冠雄与“致远”号帮带大副陈金揆奉命率60人登陆，携带两门6

磅舰炮，配合陆军作战。经过十多天的战斗，最终平息了事变。北洋海军成军后，刘冠雄被正式任命为“靖远”舰帮带大副。1891年6月，刘冠雄因为在赴台战斗中表现出色，经李鸿章上报朝廷，予以提前晋升官阶。

“致远”和“靖远”这一对姐妹舰是北洋海军中速度最快的巡洋舰，经常奉派执行一些紧急任务。刘冠雄多次随舰前往朝鲜、日本、俄国、南洋及中国香港等地执行海上巡弋、对外交涉、迎送贵宾、保护侨民等任务，增长了见识，积累了经验。

二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9月16日，清政府派出陆军增援驻守朝鲜的清军，由北洋海军运至中朝边境的大东沟登陆，然后从陆路抵达朝鲜。为了完成这次护航任务，北洋海军的主力



“靖远”号巡洋舰

战舰全数出动。9月17日早晨，增援部队在大东沟顺利登陆。上午10时，准备返航的北洋海军，发现了来袭的日本舰队。正在大东沟口外10海里处担任警戒任务的10艘北洋海军战舰，立即列队迎敌。12时50分，北洋海军的旗舰“定远”号率先开炮，黄海海战爆发。

海战中，由于提督丁汝昌负伤，“定远”号的信号装置被日军炮火摧毁，北洋海军失去了指挥，阵形被日舰冲散，各舰陷入被分割包围的危险境地。经过数小时恶战，北洋海军的“超勇”“扬威”“致远”和“经远”4艘巡洋舰先后被击沉，“济远”“广甲”两艘受伤离开。继续坚持战斗的“靖远”等舰仍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形势变得越来越不利。

一直在协助指挥“靖远”舰作战的刘冠雄，见形势危急，立即向管带叶祖珪建议：“‘定远’舰一定是受伤无法指挥了，现在情况紧急，应该立即由我舰代替指挥，集合各舰。否则，我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叶祖珪接受了刘冠雄的建议，下令在“靖远”舰上竖起令旗，担负起指挥舰队行动的重任。“靖远”舰向星散的各舰发出集合信号，在附近的“来远”“平远”“广远”3艘巡洋舰和2艘炮舰及4艘鱼雷艇，纷纷赶来会合。各舰在“靖远”舰的指挥下，又重新列队迎敌。日本舰队见北洋海军声势复振，加之天色渐黑，害怕遭到北洋海军鱼雷艇的攻击，于是全速撤离。“靖远”舰指挥各舰尾追数里，因速力不敌日舰，无法追



被击沉的“靖远”号

及，返航回旅顺。

黄海海战中“靖远”舰表现英勇，虽中弹百余发，船舱进水，官兵伤亡数十人，仍坚持战斗到海战结束，并重创日军“比睿”号巡洋舰，迫使其退出战斗。刘冠雄作为舰长最主要的助手，自然功不可没。特别是他在关键时刻建议由“靖远”舰升旗集队，更是厥功甚伟。黄海海战后，刘冠雄又随舰参加了威海海战。在这次海战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靖远”舰也被日军炮火击沉。

甲午战争结束后，劫余生后的绝大多数北洋海军军官都因战败获咎，被清政府革职遣返。刘冠雄却十分幸运，战后不久便被派往德国，执行接舰任务。战争期间，北洋海军在德国的伏尔坚厂订购了一艘850吨的新型驱逐舰，命名为“飞鹰”号。刘冠雄接带“飞鹰”号回国后，出任该舰管带。当时，整个北洋海军只有5艘军舰，“飞鹰”舰是其中最大的一艘（850吨）。刘冠雄此时在海军中的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见。

刘冠雄担任“飞鹰”舰管带期间，无意中留

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笔。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下令逮捕维新领袖康有为，展开了大搜捕。但康有为却已从天津登上了“重庆”号英国轮船，启程前往上海。慈禧太后一面电令烟台和上海方面在康有为登岸时将其捉拿，一面命天津火速派出军舰追赶“重庆”号，并下令一旦抓获就地正法。此时任“飞鹰”舰管带的刘冠雄，奉命率舰从海上追赶康有为。“飞鹰”舰的航速几乎是“重庆”号的一倍，如开足马力追上“重庆”号易如反掌。但“飞鹰”舰追至中途，刘冠雄却下令停止追赶，返回天津。

刘冠雄为何要下令军舰返航呢？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包括康有为在内的不少人认为，“飞鹰”舰是因为装煤太少，不得不放弃追赶。还有一种说法是途中锅炉发生了爆炸。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刘冠雄有意要放康有为一条生路。理由是刘冠雄留学英国数年，早已受欧风熏陶，后又受严复等人的影响，赞成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支持变法运动，因而在危难时刻救了康有为。

刘冠雄的前程并没有因为这次事件受到多大影响。不久，他的老上司、“靖远”舰管带叶祖珪被清政府重新起用，出任正在重建的北洋海军的统领。刘冠雄深得叶祖珪的赏识和信任，在海军中的地位日益显赫。1899年，清政府在英国订购的2艘主力巡洋舰“海天”“海圻”建成，刘冠雄被任命为“海天”舰管带。

甲午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掀起了新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政府无力招架，几乎是有求必应。

1899年3月，意大利也提出租借中国三门湾的无理要求，还派出3艘军舰来中国炫耀武力，并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意大利人来势汹汹，清政府不知虚实，十分紧张，遂征询海军意见。刘冠雄向叶祖珪进言道：“意大利军舰万里远航而来，一定疲惫不堪，补给也十分困难，其劳我逸，形势对我们有利。况且，我军现有‘海天’‘海圻’‘海容’‘海筹’‘海琛’5艘新购的巡洋舰，完全有实力与意舰一战。”叶祖珪十分赞同其分析，并将此作为海军的意见上报了朝廷。清政府心里有了底，断然拒绝了意大利的最后通牒。意大利本就是虚张声势，面对中国方面的强硬态度，只好放弃租借三门湾的无理要求。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朝廷中的顽固势力企图借用义和团的力量来达到排外目的，极力主战。6月21日，慈禧太后下令向11个国家宣战。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拒绝参战，他们与驻上海的各国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也纷纷加入这一“互保”行列。

海军对朝廷向列强宣战的命令也持消极态度。当时，海军各舰正在山东登州一带海面操巡，山东巡抚袁世凯力促海军各舰南下，以避联军。于是，担任“海天”舰管带的刘冠雄与队长林颖启一道，率海军各舰前往上海，并走访了各国驻沪领事，声明舰队南来是为了保护中外人士生命财产安全。这样，海军也加入了“东南互保”的行列。此次海军南下，刘冠雄在其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引起各方关注。

三

正当刘冠雄春风得意之时，一场意外的灾难突然降临。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军进攻沙俄占领的旅顺口。清政府无力制止发生在本国领土上的这场战争，只得宣布“中立”。4月23日，刘冠雄奉命率“海天”舰从烟台出发，赶赴江阴装运军火，以济辽西“中立”之需。24日，军舰遇上了大雾天气，夜里大雾越来越浓，海上能见度很低。军舰本应减速缓行，但刘冠雄认为任务紧急，凭借自己多年海上航行的经验，完全可以应付这样的恶劣天气，所以指挥军舰继续以原速穿雾疾行。25日凌晨，“海天”舰驶至长江口外舟山鼎星岛附近，准备驶入吴淞口。不料由于舰速太快，冲上了礁石，舰首高高昂起。刘冠雄急忙采取措施，但为时已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袁世凯接到“海天”舰触礁的报告后，立即派代理北洋海军统领萨镇冰星夜赶往出事现场。

萨镇冰赶到后，马上展开救援工作。“海天”舰上有3名水手失踪，其他348名官兵获救，多数被招商局的轮船送上岸，留下60人由刘冠雄带领，负责看守军舰、拆卸炮械。与此同时，萨镇冰多方联系求助。当有打捞铁甲舰能力和经验的丹麦公司打捞船到达时，“海天”舰已完全沉没，只好设法打捞舰上的设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陆续从“海天”舰上打捞起机器设备、枪炮弹药等，价值约35万两白银，其中由丹麦公司打捞的价值约12万两，海军官兵自行打捞的价值约23万两。最后，付给丹麦公司打捞费用近7万两。

“海天”和“海圻”是甲午海战后清朝最大的2艘军舰。“海天”舰的毁损，朝野震动。刘冠雄很清楚，损毁巨舰，作为管带按律当斩。但在危难时刻，袁世凯出面救了他一命。当年，刘冠雄在袁世凯力倡之下率舰南下，参加“东南互保”，袁世凯便对他颇有好感。八国联军之役后，

袁世凯破格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刘冠雄的上司，对他更加赏识和信任。袁世凯在向朝廷报告“海天”舰触礁情况的第一份上奏中，便称刘冠雄是因为“迎提军火，深恐迟误”，才不得不“冒雾前



触礁沉没的“海天”号

行”，其失误“系因公奋往”所致。所以，他在上奏中只是提出将刘冠雄“即行革职”，同时建议仍将其留在舰上，协助萨镇冰组织打捞工作，戴罪立功。此后，清廷虽有重办刘冠雄之意，但袁世凯以“其罪可诛，其才可录”为由，力请宽赦，最终使刘冠雄仅受到革职的处分。袁世凯的救命之恩，令刘冠雄感激不尽。此后，他为报答袁世凯，竭力事袁。

刘冠雄被革职以后，离开了海军，投在袁世凯门下，曾担任德州机器厂总办等职。刘冠雄善于交际，精明能干，并且颇有文才，很快成为袁世凯的亲信。几年后，“海天”舰触礁事件渐渐被人们忘记，刘冠雄又重返海军任职。1908年，他被朝廷赐予工科举人出身，1910年出任海军部军学司科长，1911年改任广东水师营务处总办。

四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刘冠雄避居上海，上海都督陈其美聘请他为沪军都督府高等顾问。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5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黄钟瑛为海军总长。在当顾问期间，刘冠雄赢得了黄钟瑛的高度肯定和信任。27日，黄钟瑛致函孙中山，请辞海军总长职务。函中称赞刘冠雄“资望才学中外共知，实足以表率海军，夙伏众望”，建议由刘冠雄担任海军总长一职。但孙中山没有同意。

局势的动荡变化很快就将刘冠雄推向了政治



福州官巷刘冠雄故居

活动的前沿。1912年2月，南北议和，孙中山辞职，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30日，袁世凯任命刘冠雄为海军部总长。11月，刘冠雄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成为民国的第一位海军上将。刘冠雄任职后，着手整顿部务，建章立制，集权于中央，使海军建设统一、有序，并收到了成效。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二次革命”。驻守上海的海军舰队暗中与讨袁军联系，准备参加起义。刘冠雄得知消息后将舰队调至烟台整训，加强控制。随后，刘冠雄亲率海军主力南下，进攻以陈其美为总司令的上

海讨袁军。8月14日，袁世凯任命刘冠雄兼任南洋巡阅使，率舰队开赴南京，镇压黄兴指挥的江苏讨袁军。又到福建以“编遣”为名，解散了宣告独立的许崇智的第十四师，把马尾船政局及各炮台收归海军部管辖。12月，刘冠雄兼任福建都督，解散了国民党福建支部。

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最终被镇压，刘冠雄指挥的海军起了重要作用。袁世凯深知这一点，因此对刘冠雄更加信任和倚重。袁世凯当政期间，内阁更换了好几届，但刘冠雄始终是海军总长的不二人选。1913年7月，熊希龄受命组织北洋政府第四届内阁时，刘冠雄曾提出，由他的老师严复出任海军总长，自己甘愿位居其次，担任海军部的次长。但被袁世凯给否决了，他在呈文上明确批示：“断不准行。”

刘冠雄虽事事唯袁世凯是从，但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在袁世凯推行帝制上明确表示反对，甚至与王士珍一道规劝过袁世凯，不料被袁世凯训斥为不懂政治，便再也不敢公开反对帝制，一度还随大流组织海军联名上书袁世凯赞成帝制。但刘冠雄从内心深处深知，跟着袁世凯搞帝制是“祸在日后”，不跟从则“祸在目前”。1916年1月，刘冠雄奉命南下镇压“护国运动”，至5月才回京。在亲身感受了全国上下汹涌澎湃的反对浪潮后，刘冠雄断定袁世凯已行将末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遂称病坚决不露面。

事实证明刘冠雄此举的明智。他的“归隐”，使他没有因支持过袁世凯称帝而受到牵连。

1916年6月6日，帝制失败的袁世凯忧愤而死，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推荐自己在海军中任职时的老上司程璧光出任海军总长，担任了4年多海军总长的刘冠雄就此下野。不久，因黎元洪、段祺瑞发生矛盾，段祺瑞去职，张勋趁乱拥立溥仪复辟。1917年7月，段祺瑞在天津起兵，驱逐张勋，重新担任国务总理。在新组成的内阁中，刘冠雄被重新请出，担任海军总长。此后，政府更迭不断，王士珍、段祺瑞、钱能训等又先后组阁，而刘冠雄始终得以蝉联海军总长。1919年12月，靳云鹏组建第12届内阁，刘冠雄去职，萨镇冰接任。这样，在北京政府的前11届内阁中，刘冠雄出任了9届内阁的海军总长。

刘冠雄虽然离开了政府，但仍与上层保持着密切联系。1920年6月，刘冠雄回福建省亲，大总统徐世昌特意电召他陪同美国公使到北京议事。1921年6月，北京政府委派刘冠雄等为查勘福建等省禁烟大员。次年11月，大总统黎元洪特派刘冠雄为福建镇抚使。1923年4月，刘冠雄又出任闽粤海疆防御使。是年10月，大总统曹锟特任刘冠雄为熙威上将军。

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海军也在内战中四分五裂。刘冠雄深感心力交瘁，遂萌生退意，多次以身体有病为由，提出辞职。1923年11月，北京政府终于同意了他的辞职请求。刘冠雄辞职后寓居天津，不再过问世事，整日以种花植树自遣。1927年6月24日，刘冠雄在天津家中病逝，终年67岁。

“伏波”号沉没

陈长极

1947年3月19日深夜，国民政府海军刚从英国接回的炮舰“伏波”号，在厦门外海被招商局的一艘货轮“海闽”号拦腰撞沉。“伏波”号军舰只有轮机长一人获救幸免，其余100多名官兵全部葬身海底。同时遇难的还有海军学校派舰见习的士官生18人。

这一海难，立即引发了一场“大地震”。“伏波”号军舰的官兵有不少是刚刚从英国接受严格

训练返还的海军精英，回国才几个月。遭此巨祸后，英国海军顿觉颜面丢尽，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政府及海军进行交涉，要求弄清失事原因。

“伏波”号沉没之历史渊源，应追溯到1927年。当年陈绍宽率海军第二舰队归附国民革命军，同年8月率舰参加龙潭战役，全歼南渡的孙传芳军队，国民政府以拱卫京畿有功授予他一等勋章和“中流砥柱”大勋旗一面。同年10月，



“伏波”号炮舰



陈绍宽

第一次西征，打败湖南的唐生智，收复长沙、岳州地区；1929年3月，第二次西征取得胜利，迫使李宗仁部队后撤，国民政府占领湖南、湖北两省。那时陈绍宽踌躇满志，准备为建设、发展、壮大中国海军大干一番事业。但是，摆在他面前的却是一条布满荆棘、坎坷不平的海军发展之路。在两次西征中陈绍宽率领的第二舰队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而陈诚率领的陆军常常吃败仗。有记者据实写了一篇《一个常胜将军 一个常败将军》的报道登载在报刊上，于是陈诚与陈绍宽结怨，不失时机地打击陈绍宽。

在蒋介石面前，陈绍宽性格孤傲、生性秉直，陈诚俯首帖耳、言听计从。据说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上，有好几次陈绍宽中途夹起公文包，愤然拂袖而去，蒋介石也奈何不得。最令陈绍宽不满的是蒋介石的“言而无信”。当时中国海军舰艇的总吨位不及日本的1/10，要发展壮大海军，一是要增加舰艇总吨位，二是要培养海军人才，这两项都需要蒋介石调拨海军经费。蒋

介石觉得陈绍宽难以驾驭，不能重用，但又慑于闽系海军的势力以及陈绍宽在海军中的威望，只好做足表面文章，对他请拨海军军费的申请满口应承，但兑现的甚少。蒋介石还在海军中另立派系，培养自己的亲信，海军电雷学校的成立即为一例。电雷学校不隶属海军部，直接归军事委员会管辖，蒋介石自兼电雷学校校长，任命欧阳格为该校教育长。因欧阳格在布置鱼雷阻塞线中贪污巨款，被陈绍宽等揭发，全国哗然，蒋介石不得不忍痛把欧阳格枪决。

1945年初冬，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从山东半岛北渡辽东半岛，蒋介石电令陈绍宽率“长治”军舰前往堵截。陈绍宽以“抗战后，海军元气尚未恢复，且绍宽在抗日期中，报效无多，已愧对国人，若再参加内战，内疚殊大”为由，借口军舰要整修，率“长治”舰从上海港启航前往台湾“整修”，并视察海军在台接收事宜。蒋介石得知后气愤至极，借端裁撤海军司令部，免去陈绍宽海军总司令职务，成立海军处，由军政部部长陈诚兼任处长，周宪章为副处长。陈绍宽因不愿打内战，在蒋介石的排挤、陈诚的打击下，愤然辞职，他要在中国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心同死灰”地回归故里，极少对人提及那段往事。

陈绍宽辞职后，由谁来领导海军着实让蒋介石头痛了一阵子。为掩人耳目，他先下手令给周宪章，令他负责接收海军总部，这样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海军被接收是海军内部的事。5个

月后，国防部成立，蒋介石又下令重新成立海军总司令部，陈诚挂名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为副司令主持海军。桂永清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实际上是陆军接管了海军。桂永清到海军任职后，带进了一大批陆军官佐，分别安插在政工、人事、财务、后勤、行政等各个要害部门，其多为少将军衔，而在过去的海军中，将官是凤毛麟角。这批海军新贵一到，顿时少将满棚，黄澄澄的一大片，充斥了海军总司令部。这些陆军将领来到海军后还是过去的老作风，走到哪，岗哨布到哪，还喜欢带着私人卫队到处耀武扬威，这在海军中是从未有过的事。桂永清到海军履新后，仍穿着陆军中将军服。当时，南京下关的江面上，常泊有英、美、法等外国兵舰，多是抗战胜利后来中国访问的舰队司令级的旗舰。由于相互之间的应酬往来频繁，外军将领对于中方老是由这位陆军中将出面表示不解和不满，认为这位二星中将对海军一窍不通，是不是中国海军无人？因此在一些场合常常对桂永清很不客气，令其下不了台。

“伏波”号军舰舰长原为柳鹤图，率舰回国后即被桂永清解职，只因他是马尾海军学校毕业的福建人，是正宗的闽系“余孽”。“伏波”号全舰官兵也被调换了将近2/3。新任舰长叫姜瑜，是正宗的桂永清嫡系。柳鹤图调走后，姜瑜一下



福州胪雷陈绍宽故居

就由副舰长升任舰长。“伏波”号出航前，海军中多位将领曾向桂永清提出此行恐会发生不测，但桂永清根本就不听劝说，照例我行我素，以致造成这次遭到国际耻笑的海难事故。一船新手，再加上没有经验的舰长，焉有不出事的道理！有人说，如果由陈绍宽领导海军，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伏波”号沉没了，但更为令人痛心的是：18名海军学校（桐梓海校）的见习生和刚从英国学成回国的海军精英，尚未报效祖国就葬身海底！

蒋介石深深感到，海军离开了陈绍宽确实不行。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两次前往胪雷拜访陈绍宽，传达蒋介石电示：“请陈赴台，共襄国是。”陈绍宽严词拒绝：“我年已逾花甲，心同死灰。岂不闻鸟返故乡，狐死首丘之说？若逼我去台，定从机上跃下，葬身闽海波涛之中！”

不老的夹漈山

黄文山

多年不见，再到涵江，亲切中夹杂着几分疏陌。这座有着浓郁水乡风味的千年古镇，变大变繁华了，城区扩大了许多，现代化的建筑，触目可见。

在一帘淅淅沥沥的春雨中，我们来到宫河口。当年繁闹的江南水街景象已全然不见，河口旁仅存的一列欧式红砖拱形骑楼，正寂寞而无奈地凝望着身下淤塞的河道。河边的大树垂拂下枝条，轻轻地拨弄着水面，似乎想捡拾一些往昔的回忆。

社会的进程就是这样，我们正在得到些什么，同时也在丢弃些什么。

这种感觉不断困扰着我，直到我们走进一座山的怀抱，走进一个人的世界。

这座山叫夹漈山。普通地图册上没有它的标识，因为它太小了，如果把戴云山的群峰比作连绵起伏的海浪，夹漈山也许只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一簇浪花。

这个人叫郑樵。他是生活在 900 年前的一位民间史学家。但他编撰的《通志》却是继西汉司



《通志》，郑樵编撰

马迁之后的又一部纪传体史学巨著，与唐杜佑的《通典》、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称为“三通”。自来有“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的说法，可知郑樵在中国古代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

因了郑樵，这座在地图上看不到名字的小山从此被载入了中国文化史册；而郑樵，也因了这座小山而被世人称为“夹漈先生”。

随着车轮欢快的转动，喧闹的城市在我们的眼里渐渐小去，清明的山色，正沿着盘旋的道路尽情铺展。由海至山，竟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这里已是戴云山脉的东段，处处林幽涧深，闲云优游，野径明灭。与城市的气氛迥然不同，一走



夹漈草堂遗迹郑樵纪念馆

到这里，忽然感到生活的节奏放慢了许多，心也变得宁静起来。在一片幽篁中，在一角翘檐下，恍惚中，夹漈先生似乎正缓缓向我们走来。

900多年前的这一位读书人，他憎恶官场黑暗，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却立下宏志，要读尽天下古今之书，贯通世间百家之学。并决意隐居山野，以布衣之身为国家著述一部集古今史学大成的《通志》。

他自筑茅屋三间，取名“夹漈草堂”。他这样描绘自己的选择：“斯堂本幽泉、怪石、长松、修竹、榛橡所丛会，与时风、夜月、轻烟、浮云、飞禽、走兽、樵薪所往来之地。”于是“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

为什么郑樵偏要选择这样一处荒僻之地读书著作呢？

这和南宋初年的时局政治有很大关系。一个

动荡的年代最容易滋养浮躁的心态。求功名的人多了，做学问的人少了。“靖康之变”后，年轻的郑樵也曾热血沸腾，多次上书枢密宇文虚中，请纓抗金，报效国家，但皆如泥牛入海。一番冷静之后，郑樵忽然明白了许多，于是收起种种幻想，毅然选择了一条隐居修史的漫漫之路。在当时，私人修史是违法的事。郑樵此举，便注定了他一生要与穷困做伴、与寂寞为伍。

最初与郑樵一起在夹漈山读书做学问的还有他的堂兄郑厚。两人志趣相投，互为砥砺，一块度过了6年的光阴。这6年是兄弟俩最快活的日子，当知道谁家有藏书，他们甚至不远千里结伴前往，必将藏书读尽方归。春暖花开的季节，只要兴致来了，他们就提着酒饭到深山里去，在水石相激处，饮酒赋诗，畅论天下大事。兄弟俩一面读书，一面讲学授徒。他们“讲学于萝林，四方从游者云集”。

郑樵 29 岁那年，在芎林寺旁建了一座修史草堂，作为今后长年修史著书的地方。他对这座草堂十分满意：“堂后青松百尺长，堂前流水日汤汤。西窗尽是农桑域，北牖无非花葛乡。”但就在这年，堂兄郑厚难耐孤寂，决意下山参加科考，在乡试、会试中均名列前茅。主考官夸赞他的文字：“索之古人中，当无一二。”不久郑厚就被授了官，而且官越做越远，直做到湖南湘乡知县。而坚持在夹漈山读书修史的郑樵却因家庭变故而陷入了极度困穷之中，常常“厨无烟火”，但他仍然“风晨雨夜，执笔不休”，独力著述“汇天下之书为一书”的《通志》。

出仕后的郑厚，似乎官声并不显赫，著述也不太丰盛。云谲波诡的宦海，消耗了他的才华，也消磨掉他的志向，此后寂寂无闻。而穷愁潦倒的郑樵，历 30 年的寂寞和 30 年的坚忍，却最终完成了 200 卷近 700 万字的《通志》，成为一代大儒。

公元 1154 年，由闽北经福州、莆田前往同安赴任的朱熹慕名登上夹漈山拜访郑樵，特地向他讨教《诗》学。时年 50 岁的郑樵正在潜心著述《通志》，见年轻的朱熹不辞辛苦攀山前来造访，非常高兴。两人对《诗》学中的《毛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当天待客的桌上只有一碟山姜和一碟盐巴，这也是郑樵日常的菜肴。然而朱熹却吃得津津有味。下山的路上，随行的书童流露出不满的情绪。朱熹笑着对书童说，老先生拿出的可都是山珍海味呀。那盐，不是海里才有的吗？那



夹漈草堂后山的郑樵石雕坐像

姜，不是山中才有的吗？朱熹因此对郑樵心中更加充满了敬意。

我们登上草堂后山，郑樵石雕坐像就静静地竖立在苍翠的松林里。周围听不到喧闹的人声，只有游云、野鸟、流泉日日和他相伴。夹漈先生左手握卷，右手执管，双目微启，若有所得。这里是先生一生的选择，也是先生一生的境界。

选择僻静、选择孤独、选择坚持，也许，就是选择成功。夹漈草堂远在戴云山东麓，其实，夹漈草堂又近在人们身旁。离尘嚣愈远，离先生愈近；离功名利禄愈远，离先生精神愈近。

古巷韶光

江 雁

福州市鼓楼区八一七北路与东泰路间，有一条东西走向、全长 850 米的巷子。巷子店铺林立，两侧杧果树枝叶盘纤，绿荫层叠，累累青果在仲夏烈日下散发出果香。巷头和巷尾立有蓝底白字牌匾，其上书写“织缎巷”三字，古韵古味，似在诉说一段锦绣韶光。

其实，因地理气候优势，福州自古便是种桑养蚕的丝绵生产重地。《福建通志》记载，古代福州养蚕，一年可繁殖 5-8 次。吐丝 8 次的蚕丝

所织就的“八蚕绵”，享誉全国。南朝梁沈约曾赞叹：“一岁八蚕，已惊其骤。”《南史·梁·到溉传》记述过一则故事：名士到溉被调至福州任“建安太守”，友人心慕福州丝织品相绝佳，托他代买两匹布料。到溉清廉节俭，两袖清风，以调侃之言婉拒道：“余衣本百结，闽中徒八蚕。假令金如粟，钜使廉吏贪。”我是穿百家衣长大的，“八蚕绵”虽好，但价格昂贵，我一介廉吏要想买得起，只得去贪污。



福州优质丝绵价格不菲，普通百姓一般消费不起，多是供应给朝廷贵族。唐朝时期，福州丝绸被列为进贡皇宫的贡品。宋代，两大掌管皇族事务且与外贸相关的机构“南外宗正司”和“西外宗正司”全部迁移至福建。“南外宗正司”设在泉州，“西外宗正司”则设在福州。此外，朝廷还在福州织缎巷特设“文绣局”以“织编供御”。官营“文绣局”管理纺织产业，所出成品专供宫廷御用。

织缎巷原称“嘉荣坊”，许是文绣局设在这里，发展成纺织一条街，才改名“织缎巷”。除了官营作坊，附近许多居民也在家中置纺机，成为私营“机房”。这些机户拥有的纺机、织匠数量可观，并有自织和代织之分。织缎巷与周围的“机房里”“锦巷”“横锦巷”等坊巷，形成公私混杂的纺织商业圈，纺工熙攘，织布声不绝于市。

当时，福州内河星罗棋布，水路发达。织缎巷邻近的安泰河，便是市区重要的水上交通要道和贸易码头。安泰河原是唐末王审知创建的“罗城”的南城外护城河。原有木板吊桥，宋代改建为石桥，即以“安泰”命名。当时这里是商业区，据《福建通志》记载，“人烟绣错，舟楫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箫管从柳荫中出。”茶楼、酒馆，伶人舞伎、笙歌鼓乐，日夜喧嚣，颇具南京古秦淮河风韵。织缎巷等出产的纺织品由车马托运，穿越这些繁华热闹，抵达安泰河码头，被搬运至成排等待的船舶上。各式各色丝绸珍品随船

队顺流而去，辗转至闽江大船，再漂洋过海进贡到朝廷和销售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各国。王世懋《闽都疏》记述：“凡福之绉（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之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

福州丝绵和闽绣除用来进贡、贸易和日常使用外，还被广泛用于戏服、佛祖和庙宇服饰装饰以及经书。神衣、神帐、佛幡、门楣彩、绣旗、宫灯等绣纹繁复、流光溢彩。现藏于鼓山涌泉寺内的来自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巴利文“贝叶经”，每片之间都以福州丝绸做成精致绸带串联成册，精致美观。福州不负“丝城”盛名，丝绣用品用途宽泛，甚至已扩展至神俗、宗教领域。

盛誉之下，需求愈广，朝廷对成品的要求也愈严苛。

文绣局从民间挑选几千名心灵手巧的男女童工，从小培养学习刺绣。老师傅一手传技，层层监督，日日考核。绣童们日复一日地穿针引线，指头内侧皆生出厚茧，绣技也随着年岁日益臻进。某太子听闻福州绣童的技艺，便想索要6名绣童为己用。绣童培养不易，个个都是宝，官方便以“绣童年幼，不可离开父母”为由婉拒了。

绣童培养体系为福州刺绣业打下夯实基础，带动、提升了行业水准。南宋福州黄昇墓出土过大量刺绣衣饰，这些丝织珍品运用了茎锁绣、贴绣、敷彩、蕊打子绣、钉线、花叶多铺针绣等多

种技法，牡丹、梅花、海棠等花卉栩栩如生、精致典雅，又镶金俏丽，不失高贵。可见，当时福州的刺绣工艺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当然，仅是绣童不足以撑起整个文绣局的运转。仗着官方势力，文绣局开始硬性征召成人男女充当织工，以适应庞大的供应链。按朝廷规定：“各处管匠官吏、头目、堂长人等，每日绝早入局，监临人匠造作，抵暮方散。提调官常切点视，如无故撤离者，随即究治。”官系工匠从清晨到薄暮长时间劳作，苛业繁重，人身不得自由。且薪资微薄，动不动被打骂惩戒，苦不堪言。家有适龄儿女的，常闭门噤声，以期躲避征召。官方只得出动军队，走街串巷地抓人，用鞭子驱赶至文绣局，强制其劳动。

文绣局如同监狱，工作环境恶劣，且监管官吏肆意克扣贪浊，胡作非为，织工们劳动强度大，又心怀怨气，常以粗滥成品回报，造成一半不能上供或外销。此外，无论是童工还是成人，男女混杂，毫不避嫌，被世人诟病“有伤风化”。文绣局原先的积极作用持续削弱，诸多弊端凸显，民怨载天。

元闽海道知事范梈曾作《闽州歌》讥讽文绣局的恶劣：“闽州土俗户不分，生子数岁学绣文。围绷坐肆杂男女，谁问小年曾识君。古来夜行斯秉烛，今者衢路走纷纷。那更诛求使者急，鞭捶一似鸡羊群。古来闺阁佩箴管，今者女工征六军。虽复太平少征战，设有备豫将何云。去年居作匠五千，耗费府藏犹烟云。官胥培克常十八，



古织缎巷文绣局再现图

况以鸠敛夺耕耘。”谴责其酷劣行径，引发百姓共鸣和激愤。朝廷不堪社会舆论压力，最终顺应民心，罢撤了文绣局。《闽书》云：“闽有绣工官，大集民间子女，居肆督责，吏因为奸利，野讷奏罢之。”徐祚永《闽游诗话》云：“宋时福州有文绣局，织编供御，男女杂作无别。元闽海道知事范梈作《闽州歌》述其弊，廉访使奏罢之。”可知，福州文绣局宋时设立，元代被撤销。

文绣局虽然被撤，但织缎巷一带私营纺织作坊的势头犹旺。发展到明代，福州丝织又产生技术性革新。弘治年间（1488-1505），机工林洪工于织布，把五层丝织改为四层丝，故名“改机”。林洪革新的“改机”，能织出比过去更加细薄的丝织新品，其产品有缎、绢、绸，装饰有闪光、阴花、龙、凤、飞禽、走兽以及福、禄、寿等花纹图案，时价等同罗织品，质量远在纱、綾之上。当时，一匹纱才80贯，而改机与罗每匹俱160贯。《闽书·风俗志》称省会纺织之利，“乃有改机之绢，衣丝”。福州锦缎的工艺水平超过

江南，虽价格居高不下，却仍畅销全国各地和海外。

郑和下西洋，从江苏刘家港航至福州长乐太平港，驻泊休整。航队人数约2.7万人，停泊时间最长达10个月。其间，他们会大量补充福州丝绸等重要物资。丝绸品从织缎巷等处生产作坊源源不断运出，随船远航。因“举之若无，裁之为衣，真若烟雾”的质感，特别受到各国贵族钟爱。

织缎巷等商圈货品供不应求，织机和工匠数量也大增，持续繁荣景象。从事丝织贸易的，由贫致富者不在少数。叶向高《家谱列传》载，族中前辈，有孟景、孟晨两兄弟，孟景公贫甚，有二子，“逐机丝为利，稍饶。已乃大饶，有数千金矣。归就故居筑室，甚宏壮”。

不幸的是，盛久必衰的魔咒并没有饶过如火如荼的纺织市场。清乾隆年间，政局动荡，各地反清起义不断，为固守统治，且皇帝认为天朝地大物博、物资丰饶，足以自给自足，便颁布了闭关锁国政策。政府实行严厉海禁，规定民众不得擅自出海，商船亦不得出海通商。这一禁令对主要以水路对外贸易的福州丝织业不啻为毁灭性打击。织缎巷一带乃至整个福州的纺织业一落千丈，大批纺织作坊伤了筋骨和元气，关门倒闭，从此一蹶不振。

此后经年，虽然左宗棠、陈宝琛、许应骙等人着力复兴，设立“桑棉局”，奏办农桑总局，附设蚕务学堂等，却都无力回天。光绪二十七年（1901），全福州仅存小型的家庭缫丝厂3家，



横锦巷

出售一些丝线而已。

难怪近代福州居民，只知有苏杭绸缎，却不知福州在宋明时期丝织业的辉煌。幸好，“织缎巷”“机房里”“锦巷”“横锦巷”等坊巷名留存至今，得以回溯过往千万织工穿梭忙碌、织布如云的繁盛场景。

织缎巷一带原有格局是两横两竖，锦巷和织缎巷是竖，横锦巷和织缎横巷是横。如今织缎横巷已经消失，旧址原在津泰中心附近。旧时，织缎巷巷道狭窄弯曲，民居鳞次栉比。20世纪90年代在这里进行“旧城改造”，巷子去弯取直并拓宽，房屋拆迁重建，才有现在的风貌。

改造前，这里都是大房子，多是商人老板的私宅，后来才成为省总工会、化工厅等单位宿舍。小孩子们经常跑到大宅里头玩，从后门进去，穿过几进院落、两三口古井、一排庭院楼阁，跑好久才会到前门。

而今，那些气派大宅都已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新式小区。门卫身着制服守在岗亭，住宅窗明几净，花草草种植其间，晾晒衣物在阳光和微风里飘动。新时代、新生活的气息如流水般温润着街头巷尾。

年过古稀的吴大爷自幼生活在与织缎巷交叉的横锦巷。横锦巷一栋1-3号楼便是在他家老房子的地基上建起来的。他现在住在金山，新家里还保存着老宅照片。照片已发皱泛黄，但过往记忆依然鲜活。曾经，推着木制小车卖肉燕、鱼丸、热牛奶等的商贩，伴着敲击和吆喝声，在窄小巷道穿梭。居民转个街角，或推开大门便能喝上撒着葱花的鲜汤和用保温壶保温的热腾腾鲜奶。“从前的日子很慢、很暖，裹在淡淡的烟火里”。

提起古时这里的纺织盛景，吴大爷感慨道：“这一带原来是做丝绸、绸缎的地方，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好的路，而且路也没那么直，有着很多弯弯曲曲的小巷子。很多纺织品的原材料通过安泰河运到这里，成品做好了再从这里运出去。清朝的时候，好像是因为隔壁制香店烤香不慎引发一场大火灾，很多地方都被烧了。”

现今的织缎巷不再挂满绫罗绸缎，已彻底改头换面，处处弥漫着饭菜香。临街的一楼店面皆出租为商铺，达道牛肉、玖笙咖啡店、老鸭粉



织缎巷一角

丝、杭州小笼包等美食店聚集，成为美食一条街。

许是附近的地铁商业圈，高耸的大洋百货、东百商城等分流、吸引了更多客人，织缎巷闹中取静，并没有想象中的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一些商家说道：“现在午饭时间这边吃饭的人也不多。其实以前这里是福州最热闹的街区。修地铁时，聚集着几千的工人群众，所以巷子两边很多小吃店生意红火。地铁修完，工人撤走，便安静了很多。”

这里离单位近，又不像其他闹区那么喧哗。我有时会跟几个朋友来这边吃上一顿转转锅。海鲜锅底，涮上几片绿油油的地瓜叶，衬着店外几簇绿荫，味觉和视觉一阵清凉、鲜香。日头闪着沙粒般光斑，碎碎洒在巷道，几辆私家车穿梭而过，一些行人打着伞慢悠悠地行走交谈。这个内心古老、外表年轻的巷子，经过锦绣繁华、沉寂与变迁后，正享受着独属的闲适、安然。

曾经的“下体井”

陈绍钦 赵麟斌

我们的出生地

时间荏苒，一晃过了六十余载。我俩分别出生于福州市鼓楼区南门兜“下体井”49号和68号。“下体井”这条街巷今已不复存在，但它却曾经走在福州市旧貌变新颜的最前列。这条街巷东临白塔，西接乌塔，偎依在老城墙边。巷靠城



旧时的福州南门

墙内，城墙外南边有排民房，民房前有条大街，就是最早的古田路。街的东向原是福州市长途汽车站，西向连接南门兜纪念碑的十字路口。1969年，福州市长途汽车站因为地盘狭小搬到五一中路，此处就改为农贸市场。为筹建福建电视台，从1974年开始先动迁农贸市场，从东往西包括“下体井”逐步拆迁，拆迁到49号停滞了很久，绍钦家恰好处在49号内。1984年又开始动迁。在很短时间内，北起下体井，南到古田路，东起新权路，西到八一七路，全部动迁完毕。下体井随之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下底井”与“夏体井”

从福州历史演化及筑城墙演变来看，下体井建巷历史应在清朝。下体井巷整个南面挨着城墙而建，明朝城墙还起着抵御倭寇的作用，因而，在明朝或之前挨着城墙边建巷的可能性微乎其

微。根据乡亲们回忆：光绪年间，巷中曾立有三元沟碑记，亦可佐证此巷应是在清朝时兴建。

“下体井”巷名应该叫“下底井”，还是“夏体井”？根据《福州地名》记载，下体井西连八一七北路的南端，东接新权路，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老巷。

下体，并非普通话词汇所指人体的下身。它是福州方言“下底”的谐音。所谓“下底”指的是相对于高处的底下之处。这里是古城墙的墙下地带，下底便指高墙的底下，旧凿一口城下的井，人们称为“下底井”。后来，城墙周边成为民居密集的弄巷，地名仍沿用“下体井”。

巷名“下体井”，若是不识福州方言的人，就会惊诧起来，觉得似乎太过粗俗。其实“下体”来自“下底”，弄清缘由便会明白。如今，巷已不见，但地下井源尚存，依旧构成了福州丰富的地下水源，静静地流淌在不为人知的内河深处……

从《福州地名》来看，巷名早在形成初期就称为“下底井”，因谐音讹称“下体井”。根据乡亲回忆：20世纪50年代门牌号即写“下体井”，但为什么以后又称作“夏体井”呢？这又是一个谜。也许因为“下体井”的称谓显得粗俗，后期遂被改成“夏体井”。下体井门牌编号共有69个。奇怪的是，巷子的家家户户都有一口井。井水冬暖夏凉，清澈见底，可喝可用。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人们全靠它生活，方便得很。盛夏酷暑，68号户内众多孩子，曾经一人拿一个脸盆将

水盛满，屏住呼吸将头埋在水中，比赛肺活量与耐力。然后提一大桶水浇身子去暑气。不少人家将西瓜沉入井中冰镇享用，又甜又凉，美滋滋，那情景至今难忘。就此曾突发奇想：我们的巷子，是否因为家家都有口井，在夏天甚是好过，而被称为“夏体井”呢？不过在改革开放年代恢复历史地名时，又改成“下体井”。我们的户口簿上注明的仍是“下体井”。

轶事趣谈

金鸿开的妈妈在下体井的巷民里，是绕不开的话题。

金妈妈家住下体井63号。她和蔼可亲，特别对家庭困难的孩子倍加关心。20世纪六七十年



金鸿开妈妈旧照



金鸿松、金鸿开兄弟姐妹及邻里林少华旧照

年代小学只上半天课，另外半天以小组形式在有条件的同学家里集中学习。金鸿开家里条件比较好，深而宽阔的房子，进入前院后有个楼梯登上二层楼，二楼左右为厢房，当中是宽阔走廊，走廊前面观礼台似的，楼下和街巷景观一目了然。后部与明朝旧城墙顶部相连。城墙顶部约3米宽，种有许多树木，其中有一棵番石榴树，每到结果时少不了我们的口福。金妈妈每每看着我们贪婪的吃相就忍不住眉开眼笑。金妈妈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她是民国时期福州最后一任市长何震的义女。

何震，字醒民，福建闽侯人，福建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住福州花巷4号。1933年毕业于第四期广州黄埔军校，兼任过《南方日报》福州分社社长。1949年8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福州前夕，何震同蔡友兰等人彻夜坐

镇福州台江上杭路工商联内维护城市秩序，对当年的社会安定和政权顺利交接有过贡献。

根据乡亲余忠良回忆，他小时候，时常与金鸿开的哥哥金鸿松一起到他的外公何震家，看见大厅悬挂着戴清朝官帽的照片。据金鸿松回忆，那是他的曾祖父，是萨镇冰舰队的军医，那照片是曾祖父与舰艇上官兵的合影。据金鸿松大姑姑回忆，当年萨镇冰经常出入曾祖父家，当时大姑姑还是个小女孩，称萨镇冰为萨伯伯。

下体井的最东头越过新权路（旧叫行马路）对面有个陡坡的小巷子，通往白塔巷，67-69号门牌即坐落于此。下体井68号住着7户人家，大家和睦相处，四邻相安。这里有户吴姓人家的爷爷是位名副其实的革命先驱。

吴适（1878—1958），字任之，号兰园，出生于连江东湖乡东塘村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

吴适痛恨清朝腐败，光绪三十四年（1908）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以推翻封建王朝为革命宗旨，把自己组织的“广福会”改称“光复会”，成为同盟会所属的一个革命团体。

宣统三年（1911）农历三月，林觉民由日本东京返榕传达同盟会在广州起义的决定，林文写信告知吴适，并派刘元栋来联络。吴适迅速组织26位革命党人，于三月二十五日（公历4月23日）从马尾乘船转香港抵广州参加起义。三月二十九日，吴适等26人编入黄兴率领的第一路“先锋队”，下午五点半投入主攻两广督署的战斗，后转攻军械局，与李准卫队遭遇激战，因寡不敌众，



吴适

起义失利。连江志士相继牺牲9人（后安葬于广州黄花岗）。吴适与黄顺基等先潜往理发店，第三天沿路沟匍匐至城外时不幸被捕。吴适身陷囹圄，被判绞刑待决。武昌起义成功后，福建督府电请广东督府把吴适护送回闽，途经厦门被统制张海珊留作襄助，后由福建督府派任省盐政监督。

民国二年（1913），“二次革命”爆发，吴适参加讨伐袁世凯。民国五年（1916），吴适召集旧部反袁护国，袁世凯死后护法军遣散。民国六年（1917），吴适再度赴粤，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内政部佾事。后任秘书，颇得孙中山信任。

民国十一年（1922），北伐军兴，吴适被委为北伐军大本营十一路司令，与孙中山同驻韶关。同年8月吴适奉令回闽召集旧民军，被委为第一警察司令驻福州。民国十四年（1925）3月孙中山逝世后，吴适亦引退，结束戎马生涯，居福州乌石山卖画自给。

吴适博学多才，能诗会画，诗画结合，意境

飘逸。曾被推为福州“龙珠画苑”副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适被聘为省文史馆馆员，选为省政协委员，任福州画院名誉院长。1958年8月28日在福州病逝，享年80岁。

下体井的商业

20世纪70年代，虽然物资匮乏，但下体井商业网点布局已相当完善。巷子东头左边对面是历史悠久的协和医院，右边至旧于山路口是原福州长途汽车站。巷子西头往左是规模较大的日杂店，日用商品应有尽有。孩童时每逢节日最喜欢到日杂店凭证购买鞭炮，一包五串，有时就把一串分解成粒状，到处摔炮，小孩间互相惊吓。往左前去有家当年规模较大的国营饭馆，内供应各种小吃面食，但必须凭粮票购买。再往前有几处规模不一的旅社。巷子西头往右有安泰诊所、酱油店、修补店、药店、照相馆、新华书店。巷子西头对面是福州当时规模最大的南门百货商店，左边卖食杂类，右边卖衣着布料生活用品之类。南门百货商店位置较高，店门前留几级台阶。“文革”时期，迫于生计，经常有人在台阶上偷偷摆摊卖水果。南门百货商店左边就是城边街（凯凝铺），巷头长二三十米，早期是个菜市场，周边从早到晚熙熙攘攘，热闹异常。往前走不远，就是著名的福州乌塔。

下体井在那年代也属“黄金地带”，被较为完善的商业体系所环绕。

下体井里巷

下体井为东西走向，东起火神庙，西至八一七路与凯凝铺相邻，北与福履营相隔，南挨明朝古城墙与旧于山路（今古田路）一墙之隔。门牌一房一号，北面东起到西有30号，南面西起到东至火神庙处有39号，共计有69号近三四百户人家。房舍六离门居多（一说洪承畴母亲因为其子叛明投清而建六矮门，拒其入门后戏称六离门），其余隶属土木混合结构。六离门木结构房屋多有前厅，后有天井。房子宽而深，家家有井，整条巷子大石头铺路。据一乡亲回忆，当时在下体井万岁境门口立有一块石碑，石碑上刻有他祖父及为铺这条石头路做出贡献的先人名字。

下体井排水沟东西走向头尾贯穿，三元沟从北到南穿过下体井。三元沟是福州最古老的排水沟之一，建于宋皇祐年间（1049—1054），清同治六年（1867）重浚。44号左墙边曾有一块三元沟石碑，为清朝光绪年间所立，位置正好是三元沟从北18号房朝南穿过45号与44号之间。下体井的元沟宽而深，可容两人。这石碑命运迂折，“文革”期间破“四旧”立“四新”，有个皮肤黝黑的老乡用大锤死命敲也敲不掉，只留下了三个窟窿。后由于巷子拆迁，石碑不知所踪。

下体井居委会与纸盒社

我们对过去的居委会印象很好，小时候找居委会办事，总是有求必应，有事当办。记忆中下



六离门



下体井居委会旧影

体井第一任主任宋梯梯是个德高望重、令人尊敬的前辈！宋主任家居下体井1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居委会就设在他家里。他的房子土木结构，十分宽敞气派，里面住有两户人家，另一户是印刷厂的欧阳厂长。一进大门就是宽敞的天井，天井右边有口大而深的水井。过了天井上两级台阶，就是宽敞的大厅，大厅面积三四十平方米，瓦顶架设硕大的木柱悬梁，悬梁筑有燕窝，静静地看燕子飞来飞去，总觉心灵和谐安详。宋主任个子高挑偏瘦，儿子在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在他的带领下，下体井合作社逐步发展壮大，解决了许多人的生计问题。宋主任有一个尊称叫“梯沙”。“梯沙”有着做纸盒的好手艺。在福州，“沙”指的不仅仅是手艺高超，还包含着受人尊重的意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



下体井理事会成员合影

待兴，在政府号召下，下体井成立了生产互助小组，主要生产纸盒，最初就几户人家规模，后来纸盒需求量扩大，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生产方式主要是家庭作坊，把任务分发到愿意做的人家里。各家各户做好纸盒就交到“梯沙”家里，一到收工时间，“梯沙”宽敞的家里便排满了盒子。随着规模逐步扩大，“梯沙”辞去居委会主任职务，专门负责合作社事宜。后因场地有限，居委会搬到福履营1号去了，街道另委派住在福履营的依玉姨担任居委会主任，任期直到“文革”后期。后来纸盒小组逐步取消，在乌山天皇岭阶梯的高处设立纸盒厂，大家以正式员工身份在那里上班，并享有正式退休待遇。

往事已矣，思绪万千。旧居不在，情意绵绵。

“省府路1号”的前世今生

陈芬

—

福州城区三坊七巷以北、开元寺以西、西湖以东、屏山之南，有一条省府路，位于省府路上的1号大院，也叫“省工交大院”，拥有1000多年的府衙历史，见证着岁月沧桑，留下军政指挥中心的印迹。

1949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进入福州。24日，福建省人民政

府成立，张鼎丞出任省主席，省府路1号也成为省政府驻地。省政府机关的各个职能部门在此相继设立。直至1969年迁至屏山大院之前，这里一直是福建省人民政府的最高府邸。

据史志记载，早在宋代这里便是福建提刑司署址；元代，成为肃政廉访司衙门；明代，为提刑按察司公署；清顺治十八年（1661），闽浙总督驻扎福州，这里成了总督府，简称“督署”，是清代管辖福建全省及浙江一带的最高行政机构。现存乾隆《福州府志》清晰地记载了总督部院署



清代闽浙总督署原貌

的沿革及建筑布局情况：在宣政街西，原按察司署，宋为提刑司署。《三山志》中写道：“明道初，提刑刘立之建。乾道间，增置武提刑。淳熙中，叶南仲始分公宇为东西厅。”正德《福州府志》记载：“元为肃政廉访司署，以东厅视事，以西厅为南台，监察分治行司。明洪武二年，改为福建提刑按察使司。十七年，佥事谢肃建福宁道署于仪门东，以旧分治行司为察院，巡按御史居之。正统五年，移福宁道署于钱局，移察院署于东街。前此大门东折。天顺三年，按察使胡新更大门于仪门之南，以旧大门前地易民居，辟东为衢。成化元年，按察使马文昇复鬻民居，辟西为衢。弘治以后，按察使李贡、夏景和、陈珂、刘逊相继营葺，拓其隘陋，更为闳敞，而门始南向。”《福建通志》中云：“国朝顺治十八年，总督李率泰移驻于此。原署在东街，今为镇闽将军府。康熙二十年，总督姚启圣市民居，拓南数十步，建牙置辕门。”对于省府路1号的历史，不光史志有记载，更有20世纪20年代在大院内出土的乾隆皇帝南巡“劝农碑”实物力证（现存福建博物院）。

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11月9日，福建革命党人在福州举义起事，结束了清朝在福州的统治。11月13日，福建同盟会在此举行军政府成立典礼，授予参加起义的清新军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以“中华军政府闽都督”之印，总理全省军事和政务。1913年，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军阀李厚基受袁世凯指派，率兵进入福建接管闽军，此处被李厚基辟为“福



1915—1920年，正在改建的福州南大街

建督军衙门”。

在今天的福州城区，省府路只能算是一条小路，但据林觉民故居首任馆长李厚威之父李昇浩生前回忆：清季，福州全城最宽的道路，就是闽浙总督署大门前的这条省府路了。而当时贯穿老城区南北的南街（八一七北路的前身）实在是太窄了。街道对面的商店店员，可以隔街与这一边的同行当面交谈。每逢总督的八抬大轿经过，他们只好暂时收起招牌，以免碰撞。1914年，中华民国司法总长许世英出任福建民政长，建议扩建马路，省府路被定位为福州第二条主干道。1920年，总督府为省长公署。1922年，海军总长萨镇冰出任福建省省长，1924年对大院门前的马路进行扩建，并拓宽两旁道路，这条“总督后街”终于在1927年正式改称为“省府路”。垂直于省府路上的一条支路叫肃威路。据熟知福州民俗历史的齐上志老先生介绍，肃威路原是省府路上的一条小巷，名叫马房巷，又叫便民巷。这条巷子东侧紧邻总督府，中间隔着的便是总督府的马厩，



肃威路



“省府路1号”大门

也是十分狭窄。每到市集开始时，马房巷就水泄不通。萨镇冰执政福建期间，扩建省府西墙边的裴仙宫，同时修建宫前马路，下令将马厩与署内西箭道合并，拓宽了马房巷，改成了一条中间有花岛的新型马路。为了纪念萨镇冰的功绩，这条长120米宽3米的巷子，以萨镇冰做福建省省长的封号“肃威”命名，肃威路由此而来。此后，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机关一直以此地为办公大院，直至抗战全面爆发。战乱期间，国民党福建省政府迁驻内地山城永安达7年半之久。

二

1952年，大院的正堂改造为礼堂。1953年，在原木结构大厅旧址上改造完毕，外形罗马式，单层砖木结构，建筑面积达2809平方米。礼堂门

口有半月形车道通过。堂内门窗、楼梯、扶手等均为楠木制作，设座位1200个，为当时全省第一流礼堂。以大礼堂为中轴线的两旁建筑，西侧是省政府办公厅、省保安处、财政厅，东侧为建设厅、教育厅，礼堂后为民政厅，都曾是战略决策部署、指挥各路建设的重要场所。

1969年，省政府机关迁至屏山大院办公后，仍有部分厅局留驻下来。当年驻有原交通厅、轻工厅、化工厅、机械厅、水电厅、冶金厅和煤炭局、电力局、供电局等，还有各厅局属下的单位，近70个部门，在此上班的总人数达2000多人，形成以礼堂为中心的井然有序的办公、生活、文化区和与之相配套的服务网络系统，是屏山大院的补充。据当年参与大院整改和管理的福建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原局长酒玉琳回忆，大院占地面积3.5万平方米，与屏山大院相比显得

地少人杂、房屋拥挤。后来此地交由省工交系统使用，故又称为“工交大院”。在省工交系统管理之下，许多旧建筑被拆改和扩建，如今这里尚有好几个机关事业和国企单位在此办公。

尤其值得一书的是，大院内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的27号楼，曾经驻有省煤炭总公司、煤炭供销公司、石油化学工业厅、煤炭集体企业咨询服务公司等。2009年，省煤炭工业集团与省建材公司整合组建成了后来的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4月，能源集团迁出，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由屏山大院迁此。2018年12月，机构改革后合并成立的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正式在此挂牌办公。

三

前临省府路，背靠鼓西路，东为八一七北路，西为肃威路，处历史街区之中的省府路1号，深含和合、和谐、和融等意，以其中规中矩的方正样貌，居于福州中心位置——福州南北走向的中轴线之中段。背靠屏山麓下福州开城之作“冶城”，下衔先后走出过林则徐、陈宝琛、严复、林觉民、冰心等名人，号称“半部中国近代史”的三坊七巷，串起福州城的整个脉络，于山、乌山峙作东西双阙，无不显示着坐拥“三山鼎峙”的枢纽格局。

作为衙门，这里曾经云集过众多的军政人物和文化大咖。据介绍，清同治、光绪年间，近代

洋务派代表人物左宗棠曾两次担任闽浙总督，都曾在此发力，推动了中国历史上久负盛名的洋务运动。因为左宗棠，福建创建了清朝第一家制造兵船、炮舰的新式造船企业——马尾船政局，福州装备起中国第一支海军舰队，走出了中国第一代海军名将沈葆楨、萨镇冰等。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后担任过海军总长和代理国务总理、后来回家乡出任省长的萨镇冰，曾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严家淦，以及一代文豪郁达夫，都在此工作生活过。1936-1938年，郁达夫出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公报室主任，积极投身福建抗日救亡运动。当年在此工作过的还有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陈乃元、方声涛、蒋光鼎、陈仪、刘建绪、李良荣、朱绍良等，他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或多或少都扮演了一些重要角色。

据曾经住在这一带的老福州人回忆，那时的省府路1号，有站得笔直全副武装的哨兵、气派威严的政府大门，在平民百姓眼里，这个戒备森严的大院蒙着一层神秘面纱，显得遥不可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建政局百废待兴，治理全局的政令都从这里发出。在这里办公过的有张鼎丞、叶飞、江一真、伍洪祥、魏金水等首长。

这里四周曾经文艺商铺鳞次栉比，尤其是当年的南后街、总督后街一带，为书籍、古玩、字画印章、裱褙、脱胎漆器集中的街区。别看过去这里只是窄窄的一条小路，却是福州著名的古玩寿山石一条街，总督府里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



裴仙宫后院的“榕城第一古榕树”

都喜欢在这里购买寿山石。省府路1号大院邻近市区最繁华的东街口，也是福州古榕最集中的地方之一，院子里树龄百年以上的古榕不下5棵。其中裴仙宫后院的一棵榕树，高约23米，围径达14.8米，11人牵手方能合抱，经考证，已有1200多岁了。据传，抗日战争时，日军投下的一枚炸弹被这棵古榕茂密的树枝拦截未炸，周边居民安然无恙，因此这棵老榕被赋予了神性。1997年，福建省政协原主席伍洪祥再回此地，见裴仙宫里百姓对该树或焚香叩拜或驻足瞻仰，遂为之

题名“榕城第一古榕树”，市民称它为福州的“镇城之宝”。如今，这棵老榕树依然生机勃勃地耸立在庙宇和府苑之间，如一位矍铄老人，端详着大院里高高低低的楼房和楼里楼外的人们。

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变迁，拆墙透绿，大院一度被改建为城市休闲广场。2010年4月，福州曾有中学生写信给政府有关部门，信里写道：“今天看到省府路口准备要拆迁建公园，看到原省政府大门的门柱上赫然写着好大一个‘拆’字。这对门柱有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历经了近百年的历史，我想留下这对门柱，不影响公园的修建，反而能衬托公园的历史底蕴。可以在旁边立一个解说牌来讲解这段历史。请主事者三思！”最终门柱还是没有保住，留下历史的隐约遗憾。随着大院原有大门和石狮的消失、格局的打破和分割，如今这个院子早已联通四方。大礼堂变为大剧院，福州平民百姓的文化生活大戏在此渐次上演。省府路周围更是相继建起高楼大厦，有福建供销大厦、新华都大厦、省府新村、达明里新村等。周边数不清的各色店铺轮番冒出，大院也成了东百商圈的停车场之一。

省府路1号大院，不仅是省会福州千年府衙演化和浓缩百年近代历史风云的博物馆和展览馆，更是与老百姓最贴近的见证生活沧桑巨变的故居杂院。作为文化街区，早已与周围的坊巷文化、东百商圈和新兴的达明美食街，共同融入福州的城市旅游资源，贯通过去和现在，撑起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两不误的根与魂。

中山路大院纪事

潘一风

1956年，福州军区成立，驻军大院开始集中在福州城东北一带。从中山路（早年叫贡院埕大街）开始，一直向北延伸到屏山顶上的镇海楼；西至鼓屏路，东至今天的观风亭街一带。军区大院包含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司令部、工程兵和炮兵司令部等。

后勤大院得天独厚，占据整个军区大院中最佳位置，离城区最近，内有著名的孙中山纪念堂、冶山和欧冶池（1964年用“第一宿舍”区域与军区政治部交换而得）。大院里有山有水有古迹，是一处历史悠久、藏龙卧虎的好地方。

驻军大院院址划分的来龙去脉，细说起来，肯定是一段非常有意思有内容有说头的故事。可惜当年参与大院规划决策和具体操作的人都已作古，既没有留下什么回忆录讲述这一段往事，也没有专门的文件资料对外披露。

后勤大院所在地的中山路是一条断头路。要论断头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城市的不断

扩展等原因，断头路比比皆是。福州城东北就有4条著名的东西走向的断头路。这4条断头路由北向南分别是今天的华林路（到华林寺断头，当年是军区政治部和炮兵司令部的分界路）、冶山路（当年是军区后勤部与政治部的分界路）、湖东路（到七星井巷和赛月巷后往东断头）和鼓东路（到井大路往东断头）。它们阻隔了福州人从



冶山路

城西北前往火车站的近路。当年人们要乘车从鼓屏路一带去福州火车站，只有绕道八一七北路，然后走东街口向东，沿着东街一直往五四路口再向北，沿着五四路到树兜再向东，如此绕一大圈方能抵达。

1970年，军区几个大院陆续搬出屏山一带，市政府下决心把屏山南麓的山包劈开，硬是修通了一条今天叫华林路的市政马路，从鼓屏路直通五四路。从此由城西北前往火车站截弯裁直，一路畅通，不再绕道东街口。到了20世纪90年代，湖东路和鼓东路又分别打通。头几年，后勤大院的欧冶池北岸修通了一条马路，名叫冶山路，从鼓屏路一直延伸到今天的观风亭街一带。新开通的冶山路所在地由西往东，依次是后勤大院的第二食堂、大礼堂、凹字楼、木楼、白楼、后勤警通连、养牛场和养猪场旧址。冶山路开通后，原来“藏在闺中人未识”的欧冶池，让人一目了然。

军区后勤大院所在地中山路当年也是一条断头路，路南连着湖东路，路北有一座中山堂。后勤大院把500米左右的中山路从中拦腰切断，一分为二，取路北一段归属部队，部队驻地地址是“中山路23号”。

当年在中山路的尽头，矗立着一座土木建筑，一大两小三开门，飞檐斗拱，黄墙黄瓦，这就是福州城内大名鼎鼎的“孙中山纪念堂”。古香古色的南大门，一直保存到1967年，后被一座现代水泥平顶门楼所取代。如今，这座拱卫着中山纪念堂的现代门楼也不见了踪影，由此被打通



中山路23号门牌

的中山路，向北连接冶山路。

所有的部队大院都有办公区和家属区的划分。有的建一堵围墙把两个区域分开，有的将两个区域混在一起。当年的后勤大院属于前者，政治部大院属于后者。

后勤大院办公区，估计占整个后勤部面积的1/4。一堵围墙将办公区围拢其中。围墙南起大广场（当年后勤部放电影的地方），北到大操场（警通连的训练场，也放过电影），东到大院南墙（墙外有一家福州精神病医院），西到曾经与军区政治部（后来归了后勤部）分隔的路。

后勤各部门约10座建筑，除了营房部，都在里面办公，区内最显著的建筑当属中山纪念堂，其他建筑都以中山纪念堂为中心依次排列展开。

明清时期，中山堂名曰“福州贡院”，是朝



福州中山堂

廷开科取士、考取秀才和举人的地方；1827年重建，“贡院”改称为“至公堂”；1904年废科举，1909年“至公堂”改称为“福建省谘议局”。

1912年4月20日，孙中山先生莅临福州，在“至公堂”会见了福建都督府的官员，并发表演说。1932年，为纪念孙中山，福建省政府将“贡院埕大街”改名为“中山路”，至公堂改名为“中山堂”。1956年军区后勤大院进入，这里成了军人办公区。1970年后勤大院搬走后，福建省商业厅搬入。2001年6月，民革福建省委会正式对中山堂进行大修，修建过程中发现堂内灰色旧墙砖砖面上刻有“道光七年”字样，证实“至公堂”至少已有170多年历史。2002年，本着“修旧如旧”原则，历时一年，中山堂终于恢复原貌，并在堂前广场矗立起一座孙中山先生铜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办公院内留下的老

建筑有6栋，分别是5号中山堂、6号小礼堂、4号和7号建筑、门楼旁边的1号和2号左右厢房。

中山堂以及大门口的左右厢房是与纪念堂连成一体的建筑群。4号楼是一座平房，是当年卫生部办公用的，它的建筑风格与院内其他新建筑风格截然不同，结构宽大敦实，门窗高大厚重，堂内所有门窗上的把手、插销、窗钩、铰链，甚至螺丝钉，都是铜制的，这在以后的建筑里是见不到的。紧挨着中山纪念堂4号楼，估计是当年中山纪念堂管理人员的办公区。7号建筑当年是财务部办事处，近似方形结构，建筑精良，玻璃门、大玻璃窗用得更多，一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别墅建筑风格。6号建筑是一个小型礼堂，礼堂不大，能容100多人，但已有些年头了。

由于办公区内老建筑不够办公，后勤大院进驻后，又新建了3栋办公楼，分别是3号楼、8

号楼和10号楼。与后勤大院当年进驻中山路后加盖的所有楼房一样，无论是办公区还是生活区，一致都是两层的砖木结构，青砖青瓦，蓝色木门窗，如此标配一致显然是当年部队简约风格的体现。办公区3栋新建筑都是两层筒子楼，3号楼是运输部，8号楼开始是油料部，油料部并入运输部后司令部搬入，10号楼是军需部、军械部和军马部所在地，后三部合一，加入运输部和财务部，成为后勤部的最大供应部的办公地。

办公区内，环境整治和管理井井有条，花草树木有专门的园丁打理，玫瑰、月季、芙蓉等鸟语花香，栀子、冬青、侧柏、黄杨等树木葱茏，绿植成片。办公区西部，还有一座十多米的小山包，花岗岩质，山脚下有个水泥防空洞，这里成了孩子们经常光顾和戏耍的区域。

另外，后勤营房部在办公区外，是一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修建的西式土木结构的黄色两层楼和一座一层的小洋房，宽敞明亮。原先这里是军区政治部的营区，交换后营房部就搬了进来。

办公区虽是部队的军事重地，但大院的孩子仍有办法隔三岔五地跑进去玩乐戏耍。

后勤部办公区有三个门，除了刚刚说过的南大门，还有两个小门，东小门和北小门。三个门一般都不设岗，只是偶尔会有战士执勤巡逻。我们四野的孩子们一般都是从东小门进入办公区，因为那里离小山包最近。

我们最爱的地方是小山包。在小山包上，大家经常玩的游戏是“攻山头”。山上一拨人，山

下一拨人，山下的孩子冒着山上孩子往下扔石粒的风险往上冲，到山顶就算胜利。偶尔也有头破血流的情况发生。

春天到了，正是豆子树结豆子的时候，我们几乎每天都泡在那里摘豆子打豆子枪，酣畅淋漓，乐此不疲。

话说政治部所在地的中山堂，我们曾在1969年进去参观过一次“毛主席像章展览”。穿过中山堂的一个小门厅，就进入中山堂的纪念堂大厅。大厅中央靠南边有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半身塑像，多少年来，塑像一直在那里注视着时代更迭，人来人往。

如果你要问当年后勤大院的男孩子们最怕谁，大家一定不假思索、异口同声地回答：“管理科科长王成民！”后勤部的管理科是管理大院秩序的行政部门。管理科隶属于后勤司令部，直接负责人职务是副参谋长。

管理科的办公地址就在办公区南大门的西厢1号房。莫须有的“王成民”科长就在里面坐镇。遇上有调皮捣蛋、干了坏事、闯了大祸的孩子，管理科肯定要出手干预。轻则拉到管理科教训一顿，重则通报孩子的家长，再严重或许就要出幻灯片和开现场会了（后勤大院的孩子曾经被拉到马鞍军区司令部开过一次现场会）。记得“文革”期间有孩子偷鸡被人告到管理科，被严肃处理了。

小礼堂也是孩子们经常玩耍之处。自从后勤部有了河边的大礼堂后，办公区的小礼堂基本弃之不用了，小伙伴们就会利用小礼堂的舞台，

煞有介事地唱歌跳舞。记得“文革”期间，三野的十几个男孩经常晚上来此，打打闹闹。有一天，他们忽而灵机一动，学着电影表演《半夜鸡叫》。当年木偶剧《半夜鸡叫》不知放了多少遍，戏中人物的表演和对话，孩子们都能倒背如流。孩子们商量好了谁演高玉宝，谁演周扒皮，分工明确后，就按照木偶剧的情节开练起来，在阵阵哄堂大笑中，复演了一遍又一遍，乐此不疲。

后来，有稍大的孩子说，老演《半夜鸡叫》没意思，还是跳跳舞吧！几个男孩子居然点头同意。大家自导自编自演，排练了一出当年非常时兴的歌舞《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一次，后勤部要组织一场孩子们的文艺晚会，有人把男孩子们表演的两个节目报晚会组织者，居然被组织者接纳，后琢磨了半天将杂乱无章的《半夜鸡叫》砍掉，选中歌舞《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演出时，一群男孩子在舞台上放开手脚，笨拙却自由地完成了他们的歌舞处女秀，一时传为佳话。

办公区 10 号楼靠墙根的地方有一口浇菜的水井。“文革”期间，后勤的孩子们突然兴起制作“砂枪”。“砂枪”其实就是一种火药枪，构造非常简单，但能发射铁砂，会伤人。只要一根铜管，一个子弹壳形成装填火药装置和后发火，然后把它们捆绑在木制枪托上，“砂枪”就完成了。

为了弄到铜管和子弹壳，孩子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天，有个孩子说，他曾看见有军人在 10 号楼井口朝井里射击，子弹壳肯定落到井里。



中山路上的老房子

10 号楼是军械部的办公楼，军械部负责管理枪支弹药，有人在后院试枪的可能性很大。我们几个孩子闻讯后，一齐来到井边。一个孩子自告奋勇先下到两米深的水井里，但水深仅二三十厘米。孩子双手在乌黑发臭的水里摸索着，不一会儿，摸出一个小子弹壳。有人眼尖，一下子认出是“勃朗宁”手枪子弹壳。“勃朗宁”子弹壳口径很小，刚好可以塞进我们“砂枪”的铜管（一般是汽车输油管），做填火药装置极佳。

几个孩子轮流下去，在冰冷的井水里继续摸索，除了运气差的，大家几乎都摸到一两个子弹壳，大喜过望，满载而归。

1969 年下半年，为了战备需要，军区大院陆续搬离城区，转移至郊区。后勤部进驻到梅峰地区的福建农学院，原来的大院划归省商业厅、中国人民银行等地方单位。自此，后勤大院的人们告别了他们相伴十多年的中山路 23 号。

民国初期“福州一中”的“校长争夺战”

边 集

福州第一中学是百年名校。其前身是创办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的凤池书院和创办于同治九年（1870）的正谊书院。它们是清朝福州四大书院中的两所。两院同在今东街三牧坊小巷内，各据东西，以巷中横跨的一座小天桥（也称楼桥，迄今仍在）沟通两院校舍，东为“凤池”（今为福一中校园），西为“正谊”（今为教师宿舍

区）。福一中的前身“书院时期”长达85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各地兴办新式学堂，乡绅潘炳年、叶在琦等闻知山西等省都已设立“省立大学堂”，培养新学人才，就向当局建议将“凤池、正谊两院合并”，闽省因此创办首所公立的新型学校“全闽大学堂”，于1902年3月正式开学。1904年清朝学部颁布学务纲要，规定只能在京师



如今的福州第一中学



正誼書院牌匾

设立“大学堂”（北大前身），各省只能设立“高等学堂”，故于当年冬改名为“福建高等学堂”，叶在琦担任学堂监督。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改由陈宝琛继任。1903年先祖父11岁时入福州西城小学堂求学，1905年即转入福建高等学堂，师从陈宝琛学习国文，成为福一中早期学子，后又在全闽师范学堂和法政学堂学习（分别为福建师大和厦大法学院前身）。他在晚年回忆中，详叙母校一些趣闻旧事，其中提到民国初期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校长争夺战”。

创办之初生源缺

全闽大学堂创办之初由布政司周莲为总办，盐法道鹿学良任会办，候补知府梁冠澄为提调，他们负责开办费与维持费，叶在琦任总教习（叶为在籍翰林），负责具体学务。当时仅划出正谊书院一部分为校所，凤池、正谊两书院并未停办。福州小学堂刚开办不久，招不到小学毕业生，只好招收举人、贡生及在文墨通顺的童生中招收“正斋生”（预备生）。“正斋生”毕业后转

为“专斋生”，方成为正式学生。辛亥英烈林觉民即为首期生。童生、秀才入学毕业后获优贡、拔贡奖励，举人入学毕业者，可直接保举为官。福州小学堂学生来自城内及各县，也有省外旅闽人士后裔及国外在榕人员子女，年龄从10岁到20多岁不等。我祖父所在西城小学堂甲班就有两名高丽（朝鲜）学生。许多学生刚从私塾转入学堂，不会讲普通话，只会说各地方言，语言交流是教学难题。

国文科目最重视

全闽大学堂创办之初的生源主要是预科生，早期学生学的课程有：修身、读经、国文、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博物（动物、植物、矿产）、生理、英语、数学（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法制、图画、体操（兵操、器械操）。英语、博物、器械课等聘外籍教师。音乐课因缺教师无法开办，至民国元年（1912）林璇留日学音乐归来被聘后，才得以开办。尽管科目多而杂，但倍受重视的是国文科，不及格者即被留级或淘汰，可谓一科定乾坤。国文含古文、作文两部分，作文多用半白话文，对字数限制严格，务求简明扼要，表达清晰。期考、年考都被列为首门，平时学堂监督不一定在校，但国文考试必由学堂监督亲自命题并到校主持考试，考卷由各位国文教师批改后评出分数，再由监督按好、中、差等级逐项亲自抽阅复核。全体学生在

国文科目上尤为用功，有些学生因加班夜读而生病，个别学生在考场上过度紧张而晕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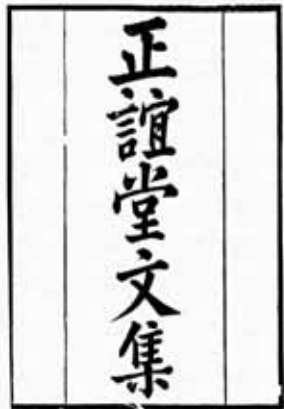
早期“山长”多人

凤池书院创建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原名“圣功书院”，有教室32间，早期经费短缺，难以为继。至道光元年（1821）由盐法道吴荣光积极筹措经费，并以所在地凤池里（状元许将居所之地）为名，改称“凤池书院”。书院主持称为“山长”，历任山长多为名人，由其出面聘任名师。第一任山长赵在田，主张学生以修养品德为先，其次才是道艺、文章。次任山长魏敬中。山长郭柏荫（字远堂）后任湖北巡抚。戊戌变法后，山长陈璧受洋务影响，重视理工，提倡学在实用。末任山长曾宗彦，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任，在思想观念上倾向维新派，同情支持戊戌变法，与“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知交，是维新组织“闽学会”骨干之一。光绪三十一年

（1905）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书院也先后停办，改成新式学堂或学校。凤池书院历时85年，前后山长12任。

正谊书院的前身称为“正谊书局”，在福州新美里，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在清同治五年（1866）创立。曾刻印书籍525卷，取名《正谊堂全书》。后乡绅杨庆琛、船政大臣沈葆楨等建议将书局改为书院，购置原东街口省立图书馆旧址的民房改建书院，到清穆宗同治九年（1870）建成，其名出自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语。最早正谊书院大门上青石所刻的横匾“正谊书院”4个斗大字，是郑世恭所书。首任山长林鸿年撰有一联：“客皆当代要津，到此地只谈风月；我本昔年都讲，愿诸生共筑云雷。”他曾任云南巡抚，在书院主讲19年，造就了一批人才。叶大焯、陈宝琛、林纾、陈衍、吴增祺等近代名人皆出其门下。

书院改为“全闽大学堂”后，首任山长为叶在琦。1903年改名“福建高等学堂”，继任的山长为陈宝琛。陈宝琛离闽赴京后由其婿林炳章接任。第五任山长是陈培崧，为东南理财龙虎三杰之一。他们均为进士、翰林出身。辛亥革命后，福州及省内各地先后光复，民国建立，陈培崧先后调任漳汀龙道、厦门道道尹，改由本堂首期毕业生、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王修出任监督。1912年1月后民国教育部令各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一律改称“校长”。1915年改名“福建省立第一中学”，后又数易校名。1952年改名“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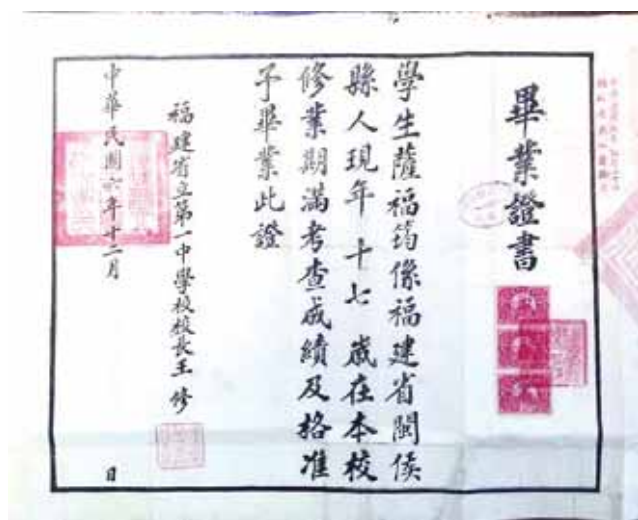
建省福州第一中学”，沿用至今，福州人习惯上均简称为“福一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高考红旗”而名噪一时。

爆发校长“争夺战”

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十一年（1922）间由王修担任校长，是历任中任期最长者。王修早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在任期间，校内重要岗位和师资多由留日高师毕业的校友担任，其他背景者很难参与竞争。民国十年（1921）前后，留日者日益减少，且中日关系日渐紧张，而本省籍升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国内各知名师范学校毕业回闽求业者日益增多，在福州教育界形成“东高”（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和“北高”（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主，包括国内其他知名师范学校）两个派系。当时社会动荡，就业困难，“毕

业即失业”是普遍现象，校长和教师岗位成为教界两派争夺的焦点。

民国十一年（1922）10月，粤军入闽，闽政重组。黄翼云出任省教育厅厅长。“北高”派把握时机，提出撤换王修，获省厅同意，当年12月底即委派“北高”毕业的张哲农出任福一中校长。但此举遭到福一中“东高”派教师的坚决反对，他们担心张哲农一旦上任势必大量裁员，改聘大批“北高”派教师替换。为共同利益，他们公开集会，反对更换校长，集体到省长公署和省教育厅请愿，要求撤回成命。当局极为恼怒，于民国十二年（1923）1月初派警察护送张哲农到校强行接任。教师们见抗议无果，便集体罢工罢教，到得贵巷租房另办左海中学，将各自学生收罗到该校。3月初，学校开学，福一中老校学生所剩无几，而左海中学则济济一堂。3月中旬，当局令警厅将王修拘捕，命其撤销左海中学，动员师生返回三牧坊原校，但王修坚决抵制，表示校长可辞，但其他事无能为力。当局无可奈何，数日后将王修释放。同年4月，北洋军阀周荫人率部抵榕，驱逐王永泉，闽局又变，黄翼云辞去厅长。原福一中教师再向当局请求处理“学潮”，当局免去张哲农校长一职，由所聘教员曹廉箴（原福一中英文老教师）任校长，原教师悉数返校，左海中学撤销。不久又任命省厅秘书魏宪章代理校长。一场激烈的校长争夺战始告平息。这场争夺战表面上是两学派教师间的利益之争，实则是民国之初社会剧烈动荡的真实体现。



民国六年（1917），由校长王修颁发的福州第一中学毕业证书

倏忽人间四月天

——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

梁从诫

北 平

香山的“双清”也许是母亲诗作的发祥之地。她留下来的最早的几首诗都是那时在这里写成的。清静幽深的山林，同大自然的亲近，初次做母亲的快乐，特别是北平朋友们的真挚友情，常使母亲心里充满了宁静的欣悦和温情，也激起了她写诗的灵感。从1931年春天起，她开始发表自己的诗作。

母亲写作新诗，开始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徐志摩的影响和启蒙。她同徐志摩的交往，是过去文坛上许多人都知道，却又讹传很多的一段旧事。在我和姐姐长大后，母亲曾经断断续续地同我们讲过他们的往事。母亲同徐志摩是1920年在伦敦结识的。当时徐志摩是外祖父的年轻朋友，一位二十四岁的已婚者，在美国学过两年经济之后，转到剑桥学文学，而母亲则是一个还未脱离

旧式大家庭的十六岁的女中学生。当年曾同徐志摩一道去过林寓的张奚若伯伯多年以后曾对我们说：“你们的妈妈当时梳着两条小辫子，差一点把我和志摩叫作叔叔！”

因此，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母亲后



林徽因

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的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母亲当然知道徐志摩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很喜欢和敬佩这位诗人，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但是正像她自己后来分析的：“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不久，母亲回国，他们便分手了。等到1922年徐志摩回到国内时，母亲同父亲的关系已经十分亲密，后来又双双出国留学，和徐志摩更没有了直接联系。父母留学期间，徐志摩的离婚和再娶，成了当时国内文化圈子里几乎人人皆知的事。

母亲开始写作时，已是“新月派”活动的晚期，除了徐志摩外，她同“新月派”其他人士的交往并不深。她初期的作品发表在《新月》上的也不很多。虽然她在风格上同“新月派”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但她却从不认为自己就是“新月派”，也不喜欢人家称她为“新月派诗人”。徐志摩遇难后，她与其他人的来往更少，不久，这个文学派别也就星散了。

1931年4月，父亲看到日本侵略势力在东北日趋猖狂，便愤然辞去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的职务，放弃了刚刚在沈阳安下的家，回到了北平，应聘来到朱启钤先生创办的一个私立学术机构，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中国营造学社”，并担



林徽因与儿子梁从诫

任了“法式部”主任，母亲也在学社中任“校理”。以此为发端，开始了他们的学术生涯。

母亲爱文学，但只是一种业余爱好，往往是灵感来时才欣然命笔，更不会去“为赋新词强说愁”。然而，对于古建筑，她却和父亲一样，一开始就是当作一种近乎神圣的事业来献身的。

从1931年到1937年，母亲作为父亲的同事和学术上的密切合作者，曾多次同父亲和其他同事们一道，在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进行古建筑的野外调查和实测。我国许多有价值的风貌尚存的古代建筑，往往隐设在已是人迹罕至的荒郊野谷之中。当年，他们到这些地方去实地考察，常常不得不借助于原始的交通工具，甚至徒步跋涉，“餐风宿雨”，“艰苦简陋的生活，与寻常都市相较，至少有两世纪的分别”。然而，这也给了他们这样的长久生活于大城市中

的知识分子一种难得的机会，去观察和体验偏僻农村中劳动人民艰难的生活和淳朴的风气。这种经验曾使母亲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震动。

20世纪30年代是母亲最好的年华，也是她一生中物质生活最优裕的时期，这使得她有条件充分地表现出自身多方面的爱好和才艺。除了古建筑和文学之外，她还做过装帧设计、服装设计；同父亲一道设计了北京大学的女生宿舍，为王府井“仁立地毯公司”门市部设计过民族形式的店面。她还单独设计了北京大学地质馆。据曹禹同志告诉我，母亲还到南开大学帮助他设计过话剧布景，那时他还是个年轻学生。母亲喜欢交朋友，她的热心和健谈是有名的，而又从不以才学傲视于年轻人或有意炫耀，因此，赢得许多忘年之交。母亲活泼好动，和亲戚朋友一道骑毛驴游香山、西山，或到久已冷落的古寺中野餐，都是她最快乐的时光。



北京大学地质馆旧楼

1937年6月，她和父亲再次深入五台山考察，骑着骡子在荒凉的山道上颠簸，去寻访一处曾见诸敦煌壁画，却久已湮没无闻的古庙——佛光寺。7月初，他们居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外面找到它，并确证其大殿仍是建于唐代后期的原构，也就是当时所知我国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新中国成立后，在同一地区曾发现了另一座很小的庙宇，比佛光寺早七十多年）。这一发现在中国建筑史和他们个人的学术生活中的意义，当然是非同小可。直到许多年以后，母亲还常向我们谈起当时他们的兴奋心情，讲他们怎样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和无孔不入的臭虫堆中摸索着测量，母亲又怎样凭她的一双远视眼，突然发现了大梁下面一行隐隐约约的字迹，就是这些字，成了建筑年代的确凿证据。而对谦逊地隐在大殿角落中的本庙施主“女弟子宁公遇”端庄美丽的塑像，母亲更怀有一种近乎崇敬的感情。她曾说，当时恨不能也为自己塑一尊像，让“女弟子林徽因”永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再盘腿坐上一千年！

可惜这竟是他们战前事业的最后一个高潮。7月中旬，当他们从深山中走出时，等着他们的，却是卢沟桥事变的消息！

战争对于父母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当时也许想得不很具体，但对于需要做出的牺牲，他们是有所准备的。这点，在母亲1937年8月回到北平后给正在北戴河随亲戚度假的八岁的姐姐写的

一封信里，表达得十分明确。母亲教育姐姐要勇敢，并告诉她，爸爸妈妈“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因此，她也要“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就这样，他们在日军占领北平前夕，抛下了那安逸的生活、舒适的四合院，带着外婆和我们姐弟，几只皮箱，两个铺盖卷，同一批北大、清华的教授们一道毅然地奔向了那陌生的西南“大后方”，开始了战时半流亡的生活。

昆 明

这确是一次历尽艰辛的“逃难”。

在我们从长沙迁往昆明途中，母亲又在湘黔交界的晃县患肺炎病倒。我至今仍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们，搀着高烧四十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店。最后幸亏遇上一批也是过路的空军航校学员，才有了一个房间让母亲躺下。这也是战争期间我们家同那些飞行员之间特殊的友谊的开始。旅途中的这次重病对母亲的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埋下了几年后肺病再次复发的祸根。

1938年1月，我们终于到达了昆明。在这数千公里的逃难中，做出最大牺牲的是母亲。

三年的昆明生活，是母亲短短一生中作为健康人的最后一个时期。在这里，她开始尝到了战时大后方知识分子生活的艰辛。父亲年轻时车祸受伤的后遗症时时发作，脊椎痛得常不能坐立。



1938年在昆明西山华亭寺。左起为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梁再冰、金岳霖、吴有训、梁从诫

母亲也不得不卷起袖子买菜、做饭、洗衣。

大约是在1939年冬，由于敌机对昆明的轰炸愈来愈频繁，我们家从城里又迁到了市郊，先是借住在麦地村一所空空的尼姑庵里，院里还常有虔诚的农妇来对着已改为营造学社办公室的娘娘殿烧香还愿；后来，父亲在龙头村一块借来的地皮上请人用未烧制的土坯砖盖了三间小屋。而这竟是两位建筑师一生中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唯一一所房子。

前面曾提到，母亲在昆明时还有一批特别的朋友，就是在晃县与我们邂逅的那些空军航校学员，这是一批抗战前夕沿海大城市中投笔从戎的爱国青年，后来大多数家乡沦陷。在昆明时，每当休息日，他们总爱到我们家来，把母亲当作长姐，对她诉说自己的乡愁和种种苦闷。他们学成时，父亲和母亲曾被邀请做他们全期（第七期）

的“名誉家长”出席毕业典礼。但是，政府却只用一些破破烂烂的老式飞机来装备自己的空军，抗战没有结束，他们十来人便全都在一次次与日寇力量悬殊的空战中牺牲了，没有一人幸存！有些死得十分壮烈。因为多数人家在敌占区，他们阵亡后，私人遗物便被寄到我们家里。每一次母亲都要哭一场。

李 庄

1940年冬，由于日寇对昆明的空袭日益加剧，营造学社追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再度西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一个小江村——李庄。这里距扬子江尽处只有三十公里（宜宾以上即称金沙江），而离重庆却有三天的水路，是个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我们住进了一处篾条抹灰的简陋农舍。艰苦的生活，旅途的劳顿和四川冬季潮湿、阴冷的气候，终于使母亲的旧病恶性发作，卧床不起。而同时父亲脊椎软组织灰质化的毛病也变得愈来愈严重。

同他们过去的的生活相比，李庄的日子真可以说是贫病交加了。然而，就在这样的境遇之下，母亲和父亲并没有被困难所压倒，而是拼上性命，继续坚持着他们的学术事业。全面抗战开始以来，辗转几千公里的逃难，我们家几乎把全部“细软”都丢光了，但是，战前父亲和营造学社同人们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记录等等，他们却紧紧地抱在

胸前，一张也没有遗失。只有那些无法携带的照相底版，还有一些珍贵的文献，他们在离开北平前，曾经存进了天津一家外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当时以为这是最安全的。不料1939年天津大水时，地下室被淹，所存资料几乎全部被毁。这个消息是两年后才传到李庄的。姐姐告诉我，当父亲、母亲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都哭了。

李庄的四年，大概仍是母亲情绪上最抑郁的时期。战争和疾病无情地击倒了她，而这里又是那样一个偏僻、单调的角落。老朋友们天各一方，难得有一两封书信往返。可以想象她的心境有时是多么悲凉。但病中的母亲这时更勤奋于学习。她在病榻上读了大量的书。我和姐姐至今还能举出不少当时她读过的书名，这是因为当时她常常读书有感却找不到人交谈，只好对着两只小牛弹她的琴。

1941年，她非常疼爱的三弟，当时刚从航校毕业不久的空军上尉飞行员林恒，在一次对日机的仓促应战中，牺牲在成都上空。噩耗传到她病榻上的时候，母亲几乎痛不欲生。此后不到两年，昆明那批空军朋友中的最后一名幸存者，也是母亲最喜欢的一个，又在衡阳战役中被击落后失踪了。他们的死在母亲精神上的反响，已不限于对亡故亲人和挚友的怀念感伤。她的悼亡诗《哭三弟恒》可以说不是只给三舅一个人，而是献给抗战时期她所认识的所有那些以身殉国的飞行员朋友的。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她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和对统治当局的责难。

抗战胜利那年的冬天，母亲离开了李庄，先在重庆暂住，但她总在想念昆明，特别是那里的老朋友们。1946年春，她终于如愿以偿，带病乘飞机再访昆明，住在圆通山后一座花园里。同老朋友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人的重聚，使她得到了几年来最大的快乐，可惜高原缺氧的昆明对她的肺病却很不利。她在这里，也写了几首小诗。

“一二·一”运动后的昆明，使母亲在政治上有了新的认识。那年3月，我这个初中二年级学生在重庆被哄去参加了反苏游行。母亲知道后，从昆明来信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说我是上当受骗，当时我还不大服气。这是我们在政治上的第一次交锋。同年8月，我们全家离开了重庆，乘西南联合大学的包机，飞向北平。

九年的战时流亡生活，终于结束了！

重回北平

母亲爱北平。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她早年的诗歌、文学作品和学术文章，无一不同北平血肉相关。九年的颠沛生活，吞噬了她的青春和健康。如今，她回来了，像个残疾人似的贪婪地要重访每一处故地，渴望再次串起记忆里那断了线的珍珠。然而，日寇多年的蹂躏，北平也残破、苍老了，虽然古老的城墙下仍是那护城河，蓝天上依旧有白鸽掠过，但母亲知道，生活之水不会倒流，十年前的北平同十年



在李庄病中的林徽因与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诚

前的自己一样，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胜利后在北平，母亲的生活有了新的内容。父亲应聘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但不久他即到美国去讲学。开办新系的许多工作暂时都落到了母亲这个没有任何名义的病人身上。她几乎是在病床上，为创立建筑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同青年教师们建立了亲密的同事情谊，热心地在学术思想上同他们进行了许多毫无保留的探讨和交流。同时，她也结交了复原后清华、北大的许多文学、外语方面的中青年教师，经常兴致勃勃地同他们在广阔的学术领域中进行讨论。从汉武帝到杨小楼，从曼斯斐尔到澳尔夫，她都有浓厚的兴趣和自己的见解。

但是，这几年里，疾病仍在无情地侵蚀着她的生命，肉体正在一步步地辜负着她的精神。她不得不过一种双重的生活；白天，她会见同事、朋友和学生，谈工作、谈建筑、谈文学……有时

兴高采烈，滔滔不绝，以至自己和别人都忘记了她是重病人；可是，到了夜里，却又往往整晚不停地咳喘，在床上辗转呻吟，半夜里一次次地吃药、喝水、咯痰……夜深人静，当她这样孤身承受病痛折磨时，再没有人能帮助她。她是那样的孤单和无望，有着难以诉说的凄苦。往往愈是这样，她白天就愈显得兴奋，似乎是想攫取某种精神上的补偿。1947年前后她的几首病中小诗，对这种难堪的心境作了描述。尽管那调子低沉阴郁得叫人不忍卒读，却把“悲”的美学内涵表达得尽情、贴切。

1947年冬，结核菌侵入了她的一个肾，必须动大手术切除。母亲带着渺茫的希望入了医院。手术虽然成功了，但她的整个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因为体质太弱，伤口几个月才勉强愈合。

1948年12月13日晚上，清华园北面彻夜响起枪炮声。母亲和父亲当时还不知道，这炮击正在预告着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即将掀开新的一页。

解放军包围北平近两个月，守军龟缩城内，清华园门口张贴了解放军四野十三兵团政治部的布告，要求全体军民对这座最高学府严加保护，不得入内骚扰。同时，从北面开来的民工却源源经过清华校园，把云梯、杉槁等攻城器材往城郊方向运去。看来，一场攻坚战落在北平城头已难以避免。忧心忡忡的父亲每天站在门口往南眺望，谛听着远处隐隐的炮声，常常自言自语地说：“这下子完了，全都要完了！”他担心的，不

只是城里亲友和数十万百姓的安危，而且还有他和母亲的第二生命——这整座珍贵的古城。中国历史上哪有那样的军队，打仗还惦记着保护文物古迹？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当时中国真还有一支这样的军队——就在1948年年底，几位头戴大皮帽子的解放军干部坐着吉普来到我们家，向父亲请教一旦被迫攻城时，哪些文物必须设法保护，要父亲把城里最重要的文物古迹一一标在他们带来的军用地图上……父亲和母亲激动了。“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值得信赖，值得拥护！”从这件事里，他们朴素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直到他们各自生命结束，对此始终深信不疑。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只生活了短短六年时间，但她的思想感情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因为，当时的新政权曾以自己的精神和事业，强烈地吸引着她，教育着她。1955年，在母亲的追悼会上，她的两个几十年的挚友——哲学教授金岳霖和邓以蜚联名给她写了一副挽联：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父亲曾告诉我，《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诗是母亲在我出生后的喜悦中为我而作的，但母亲自己从未对我说起过这件事。无论怎样，今天，我要把这“一句爱的赞颂”重新奉献给她自己。愿她倏然一生的追求和成就，化作中国读书人的共同财富，如四月春风，常驻人间！

（本文在原文基础上有删减）

祖泽家声湮水浪

刘长锋

一块美丽而神秘的绿洲，飘荡在乌龙江古螺江江面上，千百年来，“潮涨潮落默无闻，锁在深闺人不知”。这就是被称为“世外桃源”的闽侯龙祥岛。岛上居住着一支“水上神秘家族”——凤岗刘姓家族。据《凤岗刘氏族谱》载，其祖上因洪患兵祸，明初从凤岗刘宅（今仓山区金山刘宅）迁徙闽县螺江（今仓山区螺洲），明万历年间为避频发的乌龙江洪患旱灾，移居螺江南端的五虎山下门口村，清末民初因年荒等变故，又陆续回迁到螺江江中（今龙祥岛）蟹山洲一带谋生。

上百年的洲野耕渔生活，这支“派沿丰沛源尧后，疆启彭城立汉基”、出自闽中望族的凤岗刘族人，“岸民”身份虽逐渐褪去，但他们在晨曦辉映下的水浪中，依然闪烁着贵气荣光。其后裔秉承祖制，昭穆有序，累世按南宋大儒朱子先生等先贤订题的字辈取名。他们敬祖崇贤，传

承家风，厅堂正中供奉着《入闽始祖暨五忠八贤像》，两旁厅柱中书写着“大梁丰沛家声远，固始凤岗先泽长”等堂联。许多外乡人感到稀奇：“‘水上人家’哪来如此名望身世？”许多人知道的龙祥岛是“水上居民”聚居地，殊不知这支“刘姓家族”，却是肇汉皇帝刘邦和入闽始祖刘存的后裔。

那么，他们祖上因何迁徙到萋萋荒岛呢？



凤岗忠贤刘氏宗祠

据《凤岗刘氏族谱》载：这支刘姓人家入闽始祖刘存，河南固始县人，嫡出汉高祖刘邦十三世孙彭城丛亭里官大夫刘茂之后。唐僖宗中和辛丑年（881），为避黄巢战乱，刘存率三子三侄在皖、赣、粤奔波7年。入闽后，初居漳浦6年，留居福州城里10年，904年定居今福州仓山凤岗里。刘存被称为“开发金山第一人”。刘存率领入闽的胞侄刘昌祖，因佐王潮、王审知入闽有功，官封司马参军；刘昌祖还是王审知的姐夫。作为开闽十八姓功臣之一，其雕像立于福州新店莲花山闽王纪念馆内。

刘存四世孙刘文济，官后唐殿中丞侍御史，生八子皆为官，以官名命八房。龙祥岛刘氏宗祖刘维修便出自“凤岗忠贤刘氏”大中房。明初，因洪、旱灾困扰，从福州凤岗刘宅（今福州市仓山区刘宅），迁居至几十里处的闽县螺江（今福州市仓山螺洲镇）谋生。



宗祠内的纪念堂

明万历十八年（1590）到二十年（1592）持续数月大旱，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五月二十六日到八月六日接连两次200年一遇的洪患和之后兵灾动乱，刘维修后裔纷纷散迁各地，其中一支移居到螺江南端五虎山门口村一带，“开拓荒山，垦植甘茹”，与诸姓“友好相处，合制龙舟，建大王宫、玄帝庙、周都督庙、尚书府，供奉门口华安境地头列圣”。这时，有刘姓族人到蟹山江边和塔礁洲上种植水稻、菱笋等农作物，在塔礁上建“獭灵小庙”。这一带便成为“凤岗刘氏螺江世系”发祥地。清嘉庆年间，螺江维修公后裔刘尔陞子刘谦六在五虎山下门口村开枝散叶。刘谦六妻生四男，妾生五男，命名头字皆“龙”字，时称“门口九条龙”。

清末民初，刘谦六后裔人丁兴旺，而门口村山田贫瘠，又逢荒年，穷则思变，需向外谋生。时逢乌龙江螺江江面大、小洲岛相续露出，有的可以宅居。于是，九龙房族人对山田、房产、农具等进行分配，各自四处谋生创业。大多数族人慕村前水岛“洲土肥沃、水草丰美、河珍丰富，亦耕亦渔”，开始置船和渔具，逐渐从门口村迁居到乌龙江螺江中的蟹山、塔礁诸洲生活。同时，这支刘姓族人又将门口华安境“地头列圣”用抽签方式分开供奉，居西头过洋自然村（小垱）的“上片刘”供奉巡天帝王、陈文龙尚书公、周大都督及部属柳七爷

和杨三爷等，居东头门口村（大垵）的“下片刘”供奉玄天上帝、赵天君、三麻一二相公麻三太保及部属谢八爷和杨六爷等。“上片刘”龙船厝设置在门口村象鼻山下尚书浦岸上，“下片刘”龙船厝设置在门口村大垵。这两派刘氏族人每年端午节各自回祖居地举行“祭山祭神祭祖”仪式。当时没迁出的族人，守着杂田和番薯园。“上片刘”在蟹山、渡头一带山头；“下片刘”在岐头、浮岛山和门口山上。从此，他们漂泊在门口村和江中洲之间过着亦渔亦耕生活，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族谱记载的这段历史，现还留有遗俗和遗址：塔礁洲洲头刘氏大王宫在修建时，发现地下原庙砖是明代所制；每年端午节龙祥岛刘氏华安境龙舟下水后，还要划到五虎山下门口村祖居地“祭山祭神祭祖”；龙祥岛和塔礁洲刘氏村民与门口村林氏村民至今同属华安境，神位牌同奉门口华安境“地头列圣”；龙祥岛、塔礁洲刘姓家族和门口村林姓家族有关修庙敬神祭祖活动，三方都互相邀请，称兄道弟，视为乡亲，传承祖制和百年前传统。宗祖刘谦六善终后安葬在五虎山中坛元前山麓，每年清明节都有后人前往祭祀。1949年前，还存有门口村山上番薯园地，当时不少刘姓族人还到山上栽番薯。岐头山边几亩番薯园，在20世纪60年代由江中大队建了几座砖窑，十来年后停产，无人看管而荒废。此外，当年门口华安境刘氏族人与门口林氏村民共奉祀“大王宫”“巡天府”“尚书府”，今尚祀于螺洲大桥南

端的门口村和过洋自然村。

族谱和福州文史资料还记载，同属于这支刘姓的“一武一文”，与宋代理学家朱熹还有一段因缘：朱熹之父朱松在闽北时与崇安五夫里抗金名将刘子羽和胞弟文靖公刘子翬结交甚密。朱松病危时，将14岁的朱熹托付给刘子羽、刘子翬、胡宪、刘勉之四人。刘子羽在崇安五夫里屏山为朱熹母子修筑紫阳楼，供养他们。朱熹受学于刘子翬、胡宪、刘勉之三先生，历经4年，终于进士及第，娶刘勉之女为妻。成名后，朱熹为报刘家养育之恩，曾为刘子羽筹建“刘公神道碑”并撰文颂扬刘子羽，此碑现立于武夷山景区武夷宫内；朱熹还为刘家族谱作序写文，为刘家世次续题16字：“嗣世希哲，尔谦则良，克恭孝友，景用必昌。”即二十一世到三十六世次。龙祥岛刘姓子孙世代也传承朱熹所题世次，感念先贤，现传至“孝、友、景、用、必、昌”世次，可谓六代同堂。

至于《入闽始祖暨五忠八贤像》的“五忠八贤”说法，据福州史料、刘氏族谱和《榕城考古略》记载：“五忠”是刘家在宋时“殆于王事”的五名将臣，被追谥“忠简”的刘颌、“忠显”的刘翰、“忠烈”的刘纯、“忠定”的刘子羽、“忠肃”的刘琪。“八贤”是南宋时刘家八个理学先贤，即出生在福州仓山和长乐的刘彝、刘康夫、刘藻、刘嘉誉、刘世南、刘砥、刘砺、刘子玠，其中刘砥、刘砺是朱熹的学生。“凤岗忠贤刘氏”也由此而来。

南方有佳人

赖 华

邮寄地址：福州南门外禄家乡。

如此模糊的地址，却能精准投递。几位七八十岁的林姓老人，看我惊讶地张着嘴，无比开心，笑得满脸都是褶子，再次七嘴八舌地确认，没错，信封地址不用这样写：福州市闽侯县祥谦镇禄家村，因为这里曾被喻为“小香港”。

谁能想到，乌龙江中的一片小沙洲上，曾经有粮店、布店、酒楼，甚至还有人在此贩卖私盐，开地下工厂制造假银圆？村前的两个码头停

满南来北往的摇橹双桅船，日日人声鼎沸。炎炎夏日，我漫步在环岛堤岸上，走过古码头，身边闽水汤汤，江中汽笛声声，岛内却是一片静谧，唯有盛夏的蝉鸣不停不休。是什么成就了乌龙江中一片小沙洲的繁华？是什么让南来北往的客商就此停下脚步？解放战争时期，是什么让小沙洲谱出一曲英雄赞歌？又是什么令沸腾过的小沙洲重归寂静？我在江边徘徊，追寻历史曾在此造就的繁华时光，寻觅佳人远去的足迹。

传说远古时候，七星坠地，落入乌龙江，形成七块礁石。随着时间的推移，礁石阻水沉积而成七个礁洲。后来，一渔妇生产，将污秽产裤晾晒在礁石上，这个礁洲因此沉没，只余六礁。六礁连成片后形成岛屿，即龙祥岛。岛上有两个行政村，禄家村和江中村。福州乡语“六礁”与“禄家”谐音。“禄”有福气、福运之释义。“禄家村”，用七星坠地之天地灵气来命名村



龙祥岛

庄，寄托着岛上先民的殷殷期盼。

龙祥岛未通桥之前，四面环水，与世隔绝。清咸丰八年（1858），尚干镇淘江边龙屿村的林姓先祖登鲤尾山扫墓，遥见淼淼江水中一岛屿若隐若现，水草丰美，鸥鹭点点，为之心动。回村后即与族人商议，决定前去垦荒。他们先是从山上砍伐大量的细竹竿，用船运到岛上，插入沙地，以阻挡急流，令泥沙沉积。数年之后，岛上沙洲果然长高，泥层增厚。林姓先祖策公和略公率先带领7户人家40多人，驾船登岛，搭棚建舍。他们从此过着最原始的刀耕火种、与天地相抗争的垦荒生活。

我望着眼前不大的村子。小洋楼林立；家家户户门前荔枝树、龙眼树郁郁葱葱；江风掠过大片大片的甘蔗田，绿波微漾；小四轮机动车满载着从田里连根拔起的毛豆，茎秆上挂满成熟的豆荚。岛上一派生机，岁月安然，林姓先祖策公和略公在九泉之下，该捻须含笑了吧。

顺着乌龙江逆流而上，可达永泰、南平、闽清、三明等地；顺流直下，于三江口汇入闽江，而后向东，流入台湾海峡。龙祥岛位于福州市南台岛南侧的乌龙江中，是古时福州城南大门的水上交通咽喉。禄家村位于龙祥岛西面，从航拍的角度观龙祥岛，整个岛屿像一只逆流而上的大鲶鱼，而面积1.5平方公里的禄家村则像是“鲶鱼”的大

嘴巴。俗话说嘴大吃四方，从上下游而来的船只皆在此歇脚，然后转向福州城或闽江沿岸县市。因为闽江中上游是山区性河流，两岸多高山峡谷，滩多流急，往中上游而去的船只，更需要在此添加补给。

在后门渡古码头，我面南而站。抬望眼，村子南面对岸是五虎山，头虎气势昂扬地紧伴在村旁，俨然忠实守卫；码头北面与盖山隔江相望，曾经有渡船每日往返其间。村支书林晓明说，本村有两个码头，另一个在七星洲，叫前门渡码头，渡船往返于本村与鲤尾村之间。鲤尾村东去尚干，西往南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陆上交通不便，人们多选择水路出行。禄家村成了闽江上下游的中转站和补给站之后，许多外来人到此落脚做生意。渐渐地，村里商铺林立，分布粮店、布店、酒楼等；因福建山区缺盐，贩卖私盐利润高，胆大的村民即买船前往海边，贩回私盐，卖往山区；因为商品在禄家村成交量巨大，



龙祥岛上远眺五虎山

有人盯上用以交易的货币——银圆，在此开地下工厂制造假银圆。

我闭上眼睛，江风扑面，似乎感受到古码头上曾经的熙熙攘攘。似乎听到各色商贩招揽生意的吆喝声，穿戴齐整、来去匆匆的客商招呼“鸭撇仔”声，靠搬运做苦力的脚夫小心翼翼的问询声，从上游放木排到福州城的排工上岸歇脚、呼朋唤友声——禄家村下辖的文山洲水域，停泊着一大片木排。我恍惚还听到有艘摇橹双桅船上传来永泰嵩口古镇的乡音，当年往返福州—永泰的商船被称为“南港船”，此处是必经之地。或许我的先祖也曾踏上这片沙洲。无端地，我有些激动。福州城里城外，谁人不知禄家村？我看到一张照片：一封发黄的竖式信封，封面左侧是印刷繁体字“福建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右侧是收件地址“福州南门外禄家乡”，中间是收件人“林其塘先生”。民国的两张半分邮票贴在左上角。两个民国邮戳将时光定格在信封上，为一块小沙洲的繁华作证。

翻开历史书卷，浓墨重彩从来只留给大都市，一块小沙洲曾经一世繁华，却变成村里老人人口口相传的传说。唯有穿梭在茫茫光阴里的英雄的身影，不曾被历史遗忘。

村支书林晓明谈起先祖、族人时，满怀敬意。他说先祖是从尚干淘江边迁来的，因此，岛上的林姓皆称“淘江林”。祖辈林森公是所有“淘江林”族人中最令人骄傲的人物，赫赫有名的辛亥革命元勋，民国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国府

主席。1943年，林公逝世时中共中央致唁电：

“国府主席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读过历史的人，谁不知林公？！他也是我们福建的骄傲。林公出生于福建闽县尚干凤港村，是“淘江林”三十二世。我问晓明支书是“淘江林”几世，他答“三十七世”。时光还未走远，伸手可触。打开历史之门，找寻的不只是一段记忆，更是一份爱国爱家的传承。

历史也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而是一代又一代人打拼下来的生命印迹。

在村委里，和几个林姓老人闲聊禄家村的前世今生，他们谈及村里地下武工队“青鸭帮”的一段历史，让我触摸到有着铮铮铁骨质感的旧时光。

老人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国民党保安团官兵驻守在禄家村西南面的南通镇上。龙祥岛是闽江下游的咽喉要地，镇上的保安团官兵常派船在乌龙江沿岸巡弋，或是将押运的粮船停泊在文山洲岸边。为了福州城顺利解放，共产党地下党派林培琛回禄家村发展地下武装力量，这支力量就是地下武工队——“青鸭帮”，队员大部分姓林。老人接着解释，“青鸭帮”的“青”是指男子的土布黑短褂。福州方言“青鸭”和“青蛙”同音，乌龙江边的男子哪个不似青蛙般善游善泅？遇到保安团官兵追捕，“扑通”一声，跳进江中，谁能奈何？“青鸭帮”确实令保安团官兵头疼不已。原来只知白洋淀上神出鬼没的“雁翎队”，没想到禄家村也有“青鸭帮”，不禁肃然起

敬。“青鸭帮”在村里执行着上级地下党布置的任务，为解放福州城而全力以赴地与保安团官兵周旋，确保福州城的“咽喉”要地不被占领。说到兴奋之时，老人们随口而出“青鸭帮”成员的姓名：带头人叫林木枝，成员有林依万、林依阔、林明和、林玉灼、林金光等十余人，皆是青壮年。

林依港（林木枝的儿子）、林国藩两位老人带着我，参观地下武工队“青鸭帮”秘密开会地点，一座黑黝黝的单层老木屋，也是林木枝、林依港父子俩的家。把秘密聚会点设在自己家里，相当于把一家子的身家性命都搭上，何等坚定的革命意志。难怪当我要求林依港老人讲讲他父亲的故事时，旁边的老人立即笑着说，他不懂，那时才几岁呢，保安团官兵一上岛，除了他爸，全家人都逃到鲤尾山上躲了起来。也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容不得丝毫的差错，哪能把执行过的任务当作故事讲给孩子们听？两位老人还把我带到村子中央的日益超市旁，指着一个屋檐下的一块地方说，烈士陈定波于1949年8月17日上午在此就义，而福州城就在当天下午解放。我的心为之一震，久久无法言语。岁月静好，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吾辈当珍惜！

看着村里挤挤挨挨的小洋楼，可以想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禄家村的“小香港”地位。那份繁华曾给小村庄带来红利。村民除了种植农作物外，主要收入靠什么？靠运输，几个老人异口同声。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禄家村家家户户有船只，运输业做得风生水起。

随着运输走四方，“兴学育才为重”的念头在见多识广的村民心里逐渐生根。1917年秋，村里第一所学塾在林祥清祖厝里成立。林公在世时，十分注重教育，且将这支“淘江林氏”聚居地视为第二故乡，曾对禄家小学慷慨解囊捐建校舍，并亲自题写对联：“树立农村基础，养育民族健儿。”横批：“培育英才。”历年来，禄家小学先后培养出数以百计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及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南尾星，只坠坠，划船仔，去开会……”走在环岛堤岸上，望着堤坝外湿地上芦苇摇曳，苍草青青，我的脑海里不由得蹦出禄家村的这一句童谣。仿佛看见一群放学后的孩子，冲出校门，爬上自家的小船——鸭撇仔，唱着童谣，在这个南方的水乡泽国里摸蚬子、捞流蜆、掏鸟蛋、钓蟳蜆……

2013年，福州市螺洲大桥正式通车并经过龙祥岛。与世隔绝的岛屿从此变通途。随着全省交通日益发达，禄家村作为福州城南门外水上交通的咽喉要地的地位逐渐地成为历史，水上运输日渐式微，村里的青壮年携家带口转到其他地方讨生活。村庄沉静了下来。看着作为福州城呼吸吐纳的“肺”——乌龙江中的湿地，呼吸着纯净的微润江风，《诗经·蒹葭》里的诗句蓦然涌上心头，挥之不去：“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南方有佳人。

枕峰古渡头

孙源智

—

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一位名叫俞向的官员来到福州，两次任福建提刑，摄知州事数年。其人热衷风雅，流连闽中风物，虽无传记留世，但事迹散见于福州诸志中，尤其有几件值得一提。其一是采摭闽地诗文，编辑《长乐集》14卷，著名的“城里三山千簇寺”便出自该书总序；其二是修葺提点刑狱司后花园，每年仲春时节对民众开放，以昭“与民同乐”之意；其三是主持福州南驿道改途，移方山驿于枕峰，治官道以便行人。相去数百年，文集早已散佚，池阁毁塞无存，唯有枕峰故道在其后的岁月里始终发挥着功用。

枕峰，位于玉枕山之巔，因山巔如枕而得

名，自古为福州南去门户。玉枕北麓，以金牛山为支脉，隔乌龙江与清凉山相对峙，使江面收束形成峡口，古有天堑之名。时人称其“怒涛激浪，急溜旋涡，险若瞿塘”，故乌龙江在该段得名“西峡江”。福州南驿道原在峡口上游水势较缓的方山过渡，但因此处江面弥漫，“无风二十里，有风七十里”，“既有倾覆之患，又有候次之劳”，过渡后还有连绵山路阻隔，极为不便，所以过往商民宁愿取近由峡江涉险。

宣和六年（1124），俞向“以西峡水面五里，私商往来之地”，下令修治经过西峡江的新官道，以实现官民两便。该处渡口被称为“西峡渡”或“峡江渡”，峡南驿、峡北驿及渡口岸亭，均以“济川”为名。俞向又命令夹道植木为荫，使行人无夏秋暑热之苦。南宋初年出任福州教授的喻良能，出南驿道由峡江过渡，曾作诗描绘沿



途风景：“南国清秋杪，长林翠靄重。懒黄千顷稻，深碧万株榕。”从喻良能的诗中，可以想见当时夹道垂荫、阡陌相连的景象。

在西峡渡使用了近5个世纪后，曾发生改道之议。明万历四十年（1612），福建巡按御史陆梦祖认为峡江水势险恶，决定改回宋代所废旧路，主持修建阳岐江渡口，次年再治吴山渡，与阳岐两路并存，“以待人之自趋”，而原来经峡江渡的江南下八铺一并废弃。然而，事与愿违，行人因绕道往返有诸多不便，依然多由西峡渡过江，阳岐、吴山两路仅使用30年左右，驿路便改回了峡江故道。相比陆梦祖的力排众议，宋人俞向“顾闻輿人之诵”，以百姓所行之旧路改易官道而垂泽后世，可见其智慧所在。

时至今日，古驿道已成为枕峰远去的记忆，但千年来过往于此的足迹，已为这里打下深深的历史印记。由枕峰境内穿行而过的324国道，依然基本承袭福州南驿道的走向。随着乌龙江大桥的修建和公路沿途村镇的发展，古人“江行如陆，陆行如市”的愿景，在今天已得以真正实现。

二

宋元以后，经商之风行靡东南，水陆交通沿线作为南北物资流通的中转站，得到较快发展。枕峰一带既得乌龙江水路之便，又为闽粤古道必经之地，宋代以后逐渐形成数个大村落，沿乌龙江南岸支流淘江分布。这些村落中，以唐末迁居

至此的林姓一族繁衍最盛，称为淘江林氏。背倚玉枕面淘江的枕峰村，正是淘江林氏入闽肇基之初地。

据林氏族谱记载，淘江林氏入闽鼻祖为林穆，字然祐，光州固始人，系出济南长林世系。唐末五代之际，由于内地战乱频仍，林穆随同王潮避乱入闽，先后辅佐王潮、王审知二人治理闽境，对闽国政权的建立卓有贡献，官居左朝奉大夫。后梁开平三年（909），林穆择地定居枕峰，子孙繁衍，奠定宗基。林穆开基之后，其子孙多有在闽国政权任职者，但因年代久远，事迹皆不可考。

入宋以后，淘江林氏渐趋沉寂。至南宋绍定二年（1229），随着林禹臣登科成为家族中的首位进士而再度中兴。两年后，其弟林壮行以特奏名补迪功郎，授怀远县尉。两兄弟幼中童科，聪颖早慧，有“神童”之誉，至今族中还将林禹臣尊称为“神童公”，并流传着林壮行“御射状元”的佳话。宝祐元年（1253），林禹臣之子林津龙再举进士，官任常平司干办，民间称为尚书干官。林穆一族厚积薄发，在迁闽300年之后，一门兄弟父子三登第，为此后淘江文脉之盛奠下基础。

宋末元初，林津龙之子林稼翁举家迁居塔林，后人为纪念林津龙，以其官职为名将这里改称为尚干村。此后，林穆后代中以尚干一脉最盛，成为淘江林氏新的发展中心。元明两代，林氏家族进士迭出，成为当地著名的科举世家，尤



枕峰村的“穆公故里”石牌坊

其在明中叶，林壑与弟林壘、侄林钺先后登科，再创“父子兄弟科甲”的佳话。及至清代，尚干林氏已成为地方巨族，因人口繁多，村中专门设立了副县级的永庆巡检司，以协助地方管理。清朝末年，尚干又率先兴办实业，创立洋纱布局，销售福清、兴化各路，富甲一方。

枕峰与尚干，仅淘江一水之隔，林津龙一脉在尚干发迹后，不时有林氏后人迁回枕峰祖地。如今的枕峰村已是诸姓杂居，但依然以林姓一族为大。这些枕峰林姓族人，以留守祖地自居，枕峰境内至今尚保存有开基祖林穆的坟墓，经历代修复，仍墓貌如昔。村中还立有一座题为“穆公故里”的石牌坊，以纪念先人开辟之功，感怀樾荫之庇。

三

枕峰古迹，以枕峰禅寺最为知名，在现存福

建最早的方志《淳熙三山志》中已有其记载。寺始建于北宋建隆元年（960），初名观音院，又作枕峰院。宣和六年（1124）以后，驿道改由寺前经过，往来旅人于此候潮渡江，故民间习称其为候潮寺。寺于明正统九年（1444）重建，清康熙十八年（1679）重修，2005年迁建于今址，自创建至今已历上千个春秋。

福州历代方志对枕峰寺的记载都非常简单，仅称其为“候潮之所”。事实上，枕峰寺在古代高僧辈出，于福州佛教史上亦有一席之地。北宋初年，先后有清换禅师、枕峰和尚、清契禅师等高僧在此开法，一时龙象云集。曾有弟子来此请教清换禅师：“如何是法界性？”禅师回答说：“汝身中有万象。”弟子又问：“如何体得？”禅师回答：“虚谷寻声，更求本末。”这大概就是说，法性自在人心，明心自可见性，如若向外觅求，就好像是虚谷寻声，终不可得。

或许是因为地处驿路之上，满目皆是劳碌奔波的行人，这里留下更多的还是劳生未了的感慨。南宋初期，一代名宦王十朋经此前往泉州赴任，仅于寺中借食斋饭后便匆匆离去，不无遗憾地写道：“饭罢匆匆别，劳生可奈何。不能留一宿，有愧此峰多。”在他之前，临济宗高僧木庵安永禅师于此退居，不久再受黄檗寺邀请出山，口占一偈：“春深不放白牛闲，依旧随群入乱山。拽杷牵犁偿宿债，尾巴再露与人看。”一位名儒，一位高僧，虽未谋面，却在同一个地点发出了类似的感慨。历史上行走在这条驿路上的人们，还有



重建后的枕峰寺



寺中尚存的古井

多少也曾于此歇脚，又为着自己的初心而再踏上终日乾乾的征程？

明代以后，这座无数才子高僧曾经驻足的枕峰寺已远近所闻，成为闽中诗人结社雅集、吟留咏胜的佳处。林壑晚年致仕，自诩“三江渔樵，素吾所愿”，与乡人陈焯、陈娃及其弟林塗等人结“秋江夜泛”诗社，曾经相约共游枕峰寺。在他们的诗中，既没有旅途奔波后的紧张疲惫，也没有乍见风涛时的惊骇不安，取而代之的是历尽荣辱升沉后的畅快洒脱。昔年刘克庄“曛黑投山中，明发趋江滨”的焦灼，在他们眼中已变成“云连野色晴侵户，月送潮声夜到床”的适意。明末才子陈邦注在《题枕峰寺壁》中有“粉壁龙蛇怪”一句，所指的便是指寺壁上往来文人题写的诗句，可想见当年文人于此集会的胜景。

近年来，枕峰寺因建设需要而异地重建，新址依山枕江，前瞰闽江风光，视野开阔，颇为壮观。寺为砖混结构，尚未完全竣工，规模虽大，

但不算精致。寺中尚保存有大、小两座千年古石槽，其上皆有铭文，因年久字迹漫漶不清，隐隐显出沧桑的历史。枕峰寺原址附近旧有数口古井，传说为寺院僧尼所造，部分依然可供居民采水使用。

四

枕峰位于淘江、乌龙江交汇处，其下游数里即林壑所谓“三江”：乌龙江与台江在此合为马江，东行入海。因近海之故，这里向来以江潮汹涌著称，《闽都记》有“二潮吞吐，百河灌溢”之说。据说淘江就是由于江潮上涨时，水势冲突，浊浪淘沙，因此而得名。于枕峰而言，林穆随潮，旅人候潮，文人咏潮，这里的故事似乎总是与“潮”相关。潮在这里，是士子笔下的起伏，是方外心睦的正法，也是决定时代方向的律动。

清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奏立马尾造船

厂，于三江之畔、马限山旁择地立厂，创办船政学堂。一时间，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机器工业源源涌入，改变了这片土地上原本渔樵为业、耕读传家的生活。据《闽县乡土志》记载，福州在清末有超过 1/10 的人丁从事各类工业生产活动。在这样的环境下，最早一批工人运动的先驱也由此诞生，船厂工人曾在光绪八年（1882）因勇丁林永成无辜被害之事而发起罢工，迫使当局处置涉事官员。或许正是像这样的偶然胜利，逐渐化为了星星之火，最终演变成前所未有的变革潮流的先声。安眠于枕峰山西麓的林祥谦烈士，便是其中的代表。

淘江与马江仅十里之遥，淘江林裔孙在当时也纷纷前往马尾船政谋生，其中虽然也有林元铨、林舜藩等毕业于船政学堂的海军将领，但更多的还是像林祥谦一家这样从事普通生产以养家糊口的底层工人。林祥谦年轻时在马尾船厂做学徒，后入江岸铁路机务厂当钳工，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选举为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1923 年，林祥谦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其本人也在这次斗争中壮烈牺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纪念这位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枕峰一带更名祥谦人民公社，如今枕峰村依然隶属祥谦镇。坐落于枕峰山西麓的林祥谦烈士陵园，为第二批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陵园背山面水，坐东朝西，依山拾级而建，中轴线上由西到东建有陵门、墓道、烈



坐落在枕峰山西麓的林祥谦陵园

士雕像、纪念堂、陵墓等建筑。石阶、纪念堂基座、陵墓均用洁白花岗岩砌筑，显得格外肃穆庄严。古代玉枕山有诸胜，据说这里就是其中之一的风巢，仿佛是说林祥谦回祖地安葬就像是凤还巢一般。

身处与青山为伴的林祥谦陵园，让人极易联想到王十朋的诗句：“门外峰如枕，宜眠清净身。禅僧自面壁，谁是枕峰人。”抛开原诗所表达的禅趣，“谁是枕峰人”一问对于居住于此的人们而言还有着独特意味。近年村中编纂了一部《枕峰村志谱》，将村志与族谱融而为一，似乎也是在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漫漫长河上的潮涨潮消，古老驿道上的人来人往，这片土地上的花开花落，无不是属于枕峰的情感与记忆。

冶山漫步

郝苏平

最早进入我童年记忆的是两个图景：一是厦门郊外山坡上浑身嵌满弹痕的碉堡；二便是福州冶山铺满月色的石阶。

冶山很小，高不过百米，长不足半里，在福州版图上很不显眼。在华夏闻名遐迩的大山大岭面前，更是默默无闻，没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气，也不见“飞流直下三千尺”的

畅达。

也许因为小，城中享有盛誉的“于山、乌山、屏山”三山之列没有它。但春秋时期福州第一座王都“冶城”，就在这里拔地而起。从公元前 202 年起，近百年里，冶山已逐渐成为闽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后的唐、宋、元、明、清年间，官衙、督府、贡院也大多依它而



冶山登山路

傍，选址于此，或从这里生发开去……中国史学鼻祖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没忘记为它书写上浓浓一笔。谁能想到，冶山居然是这座古城走入吴越烟雨最早的见证者！这貌不惊人的石土，却给历史留下长长的身影。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冶山的月色是迷人的。

我曾经想，冶山的月光一定在多少亿年前就涂抹于这片土地了，一定是在它的沐照下地壳涌动才诞出冶山，然后，有了这条石阶……石阶就像仆人终日匍匐在它的脚下，为主人迎来送往。这其中不乏高士鸿儒、墨客才子、达官贵贾……走在这明亮而柔和的月光下，思绪都会镀上亮色和灵性。山中那摩崖石刻、苍古碑文上的奇文妙赋，不就是佐证？

中国史书里对冶山的记载不多，但山中留

传至今的白墙绿瓦、雕栏画栋告诉我，曾经有文化巨人来过这里。他们曾给冶山带来过千百年的荣光，只是后人没把它记录下来罢了。文化巨人的周围总是安静的。你看冶山，也终日笼罩在静谧里。留得枯荷听雨声……越无声，越入心。因了这静谧，古来就有：汉高祖刘邦首封的越王勾践后裔、闽越王无诸，八闽统领王审知、春秋铸剑大师欧冶子、唐朝文豪欧阳衮、爱国词人张元幹、宋朝宰相朱倬、明朝首辅叶向高、清朝名将林从时、左海伟人林则徐、晚清名臣沈葆楨、先锋学士严复、清末维新“六君子”林旭、共和先驱林觉民、民国才女冰心和林徽因等，他们都曾在这里留下过久弥不散的足音。推翻千年帝制、建立共和第一人孙中山，曾在冶山脚下驻足演讲；中国海军元老萨镇冰，也是在冶山仁寿堂走



冶山摩崖石刻



冶山上繁茂的林木

完了自己笑傲沧海、扶剑长啸的一生……正是这些从历史荒原走来的古贤名士、英烈忠良，千百年来为冶山驱走庸俗，平添了多少精彩！

冶山的石阶是花岗岩砌成，依山自下而上。坡高不过五丈，阶长未足千尺。石阶粗糙的外表已被岁月打磨得如锦缎般滑润，又被苔藓浸染成绿宛如翠玉。我的童年有幸与冶山为邻，那时的家就在冶山脚下，每天上学放学、食堂打饭、商市采买、嬉闹玩耍都要走过这段石阶。我熟悉它春天的温润、夏日的暖、秋天的凉和冬日的清冽……

石阶之上，便是繁茂的林木。有榕树、樟树、相思树、乌桕树和叫不出名字的树。在不同季节里，榕树上的粉紫色浆果、相思树上的驼黄色小花，还有晚秋红叶、清夏败蕾，都会落到石

阶上，行人匆匆走过，便踏出条条色彩不一的“花毯”，真是赏心悦目。月亮升起时，微风吹来，树影摇曳，月光便从枝叶缝隙中渗漏下来，银晃晃、亮闪闪地跳跃着撒落在石阶上，又顺着山石沟壑曲曲弯弯向下流泻而去……那又是一番别样景象。当然，这都是我五六十年前的记忆了。

五年前我又登过冶山，已觉得美若梦境的月夜才是世间最嗨的风景。而最奇妙的赏心，是漫步在幽寂里形单影只时的神闲气静……这会儿，走在月色铺就的石阶上，不再有漂泊游子归乡时的苦恋和饱尝世事炎凉的哀怨，只是那飞檐下垂吊的风铃响起，你很容易将遐思冥想搁浅在这里……你发现了两个自己：一个是童年的自己，一个是当下的自己。两个自己恍惚在云间对语：那时的自己每周至多能看一部电影、一本课外读

物，现时的自己每天来自互联网的信息就浩瀚如海；那时的自己嗜好戏耍喧闹，现时的自己喜欢静穆独处；那时的自己清纯而率真，现时的自己附庸了不少混沌和俗气。

冶山是有灵性的。来此漫步，除了追忆还有解惑。解惑是审美的开始。你走在石阶上，那寒窗冷雨、茅舍浅雾、野塘残柳、古厝瘦竹如海市蜃楼般地浮现出来。而那击磬小唱、抚琴低吟、酒酣诳语、拔剑长歌也会如晨钟暮鼓撞击你的心灵。紧随而来的，就是精纯、悠远的愉悦和畅想。你会感叹人类审美的神奇，只有站在那里的人，才会从简单重复的日子里看出不一样的风景。

不久前我再登冶山。静谧月色中的那层层石阶，恍如一系列或舒缓或激越地鸣奏生命狂想的琴键。记录下古圣先贤也记录下你的人生步履。古往今来，没有谁能永远闪耀，一千年？一万年？早晚都会随着时光如尘埃飘散殆尽。人生很短，不被世俗左右坚守底线把自己的梦做到底，确实很难！可冶山做到了：它金玉其中却深藏不露，不因“小”而屈膝，不因“弱”而谄媚，不因“贫”而自弃，不因“暮”而忧伤，不因遭人冷落而消沉，不因被人误解而沮丧，就这么坦坦荡荡、大大方方地放在那儿，一放几千年。

光阴，总是让深刻的东西越发深刻，让浅薄的东西越发浅薄。时间愈久远愈有价值！人们陆续在此发现：春秋欧冶子铸剑时的欧冶池；西汉闽越王都宫殿的断壁残垣、硬陶瓦当；盛唐年间喧嚣犹在的马球场；唐元和八年（813），福州



仁寿堂

刺史、福建观察使裴次元在此辟出的二十九景、题咏景诗赋数十首；唐末五代，闽王王审知设于冶山南麓的衙署，宋末端宗沿用称之垂拱殿。还有喜雨轩、剑光亭、仁寿堂、泉山摩崖题刻等遗址开始一一重现，熠熠生辉。我恍然醒悟：冶山其实很大很大。人们以它命名建造的颇具规模的“冶山春秋园”已搁不下它，再为它添建“冶山遗址博物馆”！丰厚的文化蕴藏，赋予它不菲的



欧冶池

传世价值。价值，使它迸发出不朽魅力。魅力，又引得历史与后人一次次地将它拥吻。

它默然静立于城中一隅，不躲避也不辩解，不悲戚也不逃遁，不消沉也不惧化成废墟的归宿。从现在起，我真的该对它深情地仰望了。

冶山依然有无数的未知包裹着它。也许正是这些未知，才使它保留着与众不同的厚重、鲜活和趣味，让观赏者品咂不已。

我不知福州“三山”可有更古老的史迹残遗，冶山的处处留情，已够你怀想当年的盛世风采。你会在此蓦然领悟：山有君临天下的气势和气概，并不全在巍然壮观，更在其内核里“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灵逸与壮阔。万籁寂静中是谁在吟诵余光中的诗句：“酒入豪肠，七分酿成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

唐？”冶山当然不曾有十万脚灯照宫墙的奇景，只有石阶尽头一笼黄灯熠熠惑眼，就这么展开了你一生的长梦。

冶山的风景是挥之不去的梦境，是与生俱来的谦和，是难以抗拒的感召，是跨越似懂非懂年岁的干练。每一次登冶山，都像重新经历了一次成人礼，又像回到十六岁，再雄心勃勃、精神抖擞地活上一回，宛如更新自己。

不要再责怪那日复一日的平淡无奇，只有富足起来的内心才会一次次在此与惊艳邂逅。那时的冶山，也许正是你通向生命巨峰的“石阶”。你拾级而上，心灵便一同跃上一个新的高度，一同迈向一个可以自由畅想的殿堂。我想，每个来此登临的人，都会怀揣各自人生的疑惑和追问，前来完成一次圣洁的洗礼与修行。

福清有个“台湾村”

郑敬平



林文镜

1990年，中国改革开放正朝着广度和深度发展，“土地政策”出台，鼓励外商有偿成片开发土地。林文镜先生欣然响应，在他故乡福清溪头村注册成立以父亲名字命名的“洪宽工业区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洪宽工业村”）。海外侨领独资创建“工业村”，即便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特区，当时也还没出现过。

洪宽工业村第一期规划面积2平方公里，3年后拓展到10平方公里，覆盖周围12个村，占所在阳下镇（2015年撤镇设街道）1/3区域。其时阳下镇还属农村，“洪宽工业村”首先面临的是征地问题。

时任福州市委常委、福清市委书记练知轩，在征用土地方面给予林文镜大力支持。

1991年4月，第一期2平方公里工业村规划图绘制完毕，铺设水泥路6公里，输入10千伏安高压电线路2条，引进120对程控电话，建成4

万平方米厂房、5000平方米职工宿舍、850平方米白领公寓、1100平方米食堂、3座日供水2000吨水塔、4700平方米综合商场、4000平方米康乐中心等，总共完成工程投资近1亿元人民币。1993年开始向10平方公里拓展。

但是筑好“巢”，并不一定就能引来“凤”。洪宽工业村中心设在溪头村，虽离城区只有7公里，但毕竟是乡下。

习总书记多次到福清调研并现场办公，给出“招商引资”八字真经：“以侨引侨、以侨引台。”

1994年，台湾著名电影导演凌峰在拍摄大型纪录片《八千里路云和月》时，在福州听说福清

洪宽工业村有 70 多家台商在那里投资办厂，感到很稀奇，便前来参观。一看，十分感动，激发了灵感，临时决定增拍一个短集，名曰《福州有个小台湾》。这个短集在台湾放映时，引起意外的轰动。后来，新闻媒体称洪宽工业村为“福建台湾村”。

据《习近平在福州》载，福州市委原副书记、福州市原市长练知轩对记者说：福清“还有一个洪宽工业村，现在集中了 70 多家台资企业。这个地方，当时就被称为福建的‘台湾村’。让人感动的是，这个工业村每一次奠基剪彩、投产剪彩，习总书记都会亲自到现场”。

那么，第一家台资企业是如何被吸引进入洪宽工业村的呢？

二

1990 年 7 月，洪宽工业村一开张就创造了一

个神话：把一位“白领”台胞打造成企业家。

这位台胞姓陈，原先在融侨开发区一家台资塑胶厂工作。陈先生自然想当老板，但他十分清楚，当老板需要足够的资本。他所缺的就是资本，虽然薪水不菲，有所积蓄，但离当老板所需要的资本还差得很远。

洪宽工业村总经理名叫林运茂，是林文镜的堂弟。林运茂 1952 年从印尼回国，1957 年从山西太原工业大学毕业，分配在大同煤矿任机械工程师，曾当选大同市人民代表，1975 年获准到香港定居，出任林氏集团设在香港的中国太平集团太平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1985 年 12 月，林文镜把林运茂从香港调回溪头，面授机宜，要利用“洪宽基金”，在溪头发展外向型经济。林运茂领命，从香港带回两个外向型项目：一是 1988 年建成溪头造纸厂，从香港进口废纸，生产瓦楞纸返销香港；二是 1989 年建成玩具厂，承接香港来料加工玩具业务。但是，当大哥把他推上洪宽





洪宽工业村今昔对比

工业村总经理位置的时候，他发现造纸厂对水源有污染，非长久之计，且违背了大哥要把溪头建设成花园式的现代新农村的意愿。而玩具厂属来料加工，总归是靠别人的“米”来下锅，也不是很有前途的项目。于是决定把上述两个项目关、停、并、转。首先是玩具厂，其主要设备可用于生产雨衣。于是，林运茂想到在融侨开发区台资塑胶厂打工的那位陈先生。

林运茂对他说：“到我们洪宽工业村来，我圆你一个做老板的梦。”

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林运茂跟他开玩笑。林运茂说：“我跟你说的是正经事。我们原来有个玩具厂，现在不办了，机械设备可以用，你

先用，等赚了钱再买下。厂房也是现成的，低价租给你，租金也等到你赚了钱再付。如果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不够，我们公司还可以为你担保向银行贷款。”

有这等好事，谁会不愿意干？陈先生欢天喜地走进洪宽工业村。

由于陈先生对塑胶生产工艺、管理和销售渠道轻车熟路，又是劳力密集型企业，低廉的劳动工资大大地降低了成本，再加上洪宽工业村开发公司全方位的扶持和服务，陈先生一举成功，一年赚下一个工厂，成为名副其实的老板。

陈先生的神话，为洪宽工业村打出了一面活广告，吸引众多台商前来投资办厂。

其实，洪宽工业村能吸引众多台商来投资办厂，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洪宽工业村成为国家级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组成部分，享受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

还有个原因，读了下面一则故事就明白了。

三

故事发生在1997年。

融城的秋天依旧谦逊，到处不见秋的颜色，还是那样绿，那样生机盎然。

融侨大酒店里，林文镜好似明星，很多人围着他，有外商、台商，有乡亲，还有他手下的“将士”。其中有位台商向林文镜诉苦，说他在洪宽工业村遇上麻烦，有一填土工程包给溪头村一位年轻人，合同签了，钱也拿了，可工程做了一半，却要求追加承包费，扬言若不追加承包费就停工。

林文镜大吃一惊，在洪宽工业村居然发生这

种事情！问：这个问题向工业村开发公司反映过吗？回答说，反映过了，但没有回音。

林文镜很生气，立即叫身边的人通知开发公司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总经理林权到酒店来见他。

林权很快赶到酒店，听大哥问起此事，面露难色。

原来，那位承包台商填土工程的年轻人是林文镜堂弟未过门的女婿。这个承包工程发生纠纷，事出有因。林文镜的侄女婿是从外地工头手上转包来这个工程。因为台商发包工程时采取的方式是“喝标”，那个工头与台商签下合同后，才到工地实地丈量，结果把自己吓了一跳：与台商签订的合同承包款仅够完成一大半土方量！但工程合同已签订，不好反悔，所以用了“金蝉脱壳”之计，按原合同把工程转让给林文镜侄女婿。

林文镜的侄女婿读书不多，以为是外地工头害怕“强龙斗不过地头蛇”所以转让。结果，承包款都用完了，工程才完成一大半。

这无疑是一个两难纠纷：台商坚持按合同办事自然无可指责；承包方要求追加经费也不是没



有一点道理，总不能叫他贴钱做工程吧！

林文镜听罢事情的来龙去脉，便叫林权把侄女婿叫来。

林文镜的侄女婿很快就赶到酒店，怯生生地站在林文镜面前。林文镜没有责备他，只问他，还需要多少钱才能按期完成工程。回答说，有10万元就够了。林文镜说，这钱我来出。并对林权说，从公司拨给他11万元。又对侄女婿说，你必须按期完成工程。大伯千方百计把客商引到我们溪头来，你们要千方百计把客商留下来，这就是对大伯的最大支持。

最初，很多人不理解，林文镜为什么要贴钱办工业村。后来理解了，却又出现一个不理解的事：那就是洪宽工业村开办“海峡农业实验场”。

四

21世纪的第一个春天，经贸部、农业部和国台办授予林文镜在洪宽工业村创办的全国第一个海峡农业实验场“闽台农业合作交流示范基地”牌匾。

曾有香港《大公报》记者问林文镜：“作为世界级企业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和财力引进台湾农业专家，在洪宽工业村建立海峡农业实验有限公司？”

林文镜的回答是：“在台湾，农民耕作一亩地，年均产值可达五六万元人民币。台湾农业的高效益，在于致力于发展高优农业，发展高优农



20世纪90年代的清华糖厂

业关键在于优良品种、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

早在1989年，林文镜就着手从台湾引进优良甘蔗种苗，最初的动机是为了要救活清华糖厂。

这个与北京著名学府同名的糖厂，是20世纪80年代初福清华侨与家乡政府合资经营的糖厂，故以“福清华侨”的简称“清华”为名，也是福建省第一家与华侨合资经营的大型企业。但是，第一期刚上马就遭遇“吃不饱”的问题。由于甘蔗产量不高，经济效益低下，影响了农民种蔗的热情。林文镜通过台湾朋友的关系，请了专家来福清“会诊”，留下两条意见：一、甘蔗品种不良。二、耕作管理落后。于是，林文镜想从台湾引进甘蔗良种。但终因“远水解不了近渴”，没等到良种的效益重新鼓起农民种蔗的积极性，清华糖厂就因“无米之炊”而告关闭改业。

香港《大公报》记者又问：“林先生，当初你从台湾引进甘蔗良种与清华糖厂有关，现在引进台湾高优农业，好像跟工业村没什么关系吧？”

林文镜说：“我的家乡福清，本来就是农村。

搞工业村是为了农民早日奔小康，搞高优农业也是为了农民早日奔小康。改革开放后，福清农业经济虽然跻身全国百强县（市）第10名，但主要是水产养殖和禽畜业比较发达。福清有50多万亩耕地，目前平均年亩产值只有一两千元。如果推广台湾发展高优农业经验成功，只要每亩年产值提高到5000至1万元，全市年农业产值就可以增加40至50亿元。所以，发展高优农业，是福清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农业每提高1元的产值，农民就可以得到至少5角钱的实惠。因此，发展高优农业，也是绝大多数农民更快富裕起来的一条捷径。”

为此，林文镜四处奔波，放弃了许多赚钱的机会，数十次专程到台湾考察，央朋托友寻访农业专家，声言：肯到福清开发高优农业的专家，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只要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都不是问题。林文镜的赤诚之情，终于打动了享

有“台湾十佳农民”之誉的两位庄氏种果专家。1999年春节，林文镜在洪宽工业村划出3000亩作为农业示范基地。海峡农业实验场、福清洪宽海峡农业实验有限公司挂牌成立，第一批引进台湾高优品种40亩，如“小可爱”（小粒西红柿）、印度枣、“黑美人”（小颗西瓜）、芭乐（番石榴）……首先在溪头村推广。2000年4月，已发展到2000亩，成为向全市推广高优农业的示范基地，也成为福建省两大海峡高优农业示范区之一。

这一年，林文镜与阳下镇政府协商制订了2万亩高新农业发展规划，并深入地头田间，向农民群众宣传相关政策和措施，同时以协议和公开登报等形式，承诺洪宽海峡农业实验场提供的种苗保质保量，还包收益，凡卖不出去的鲜果，一律由洪宽公司收购，保证每亩收益不少于3000元。于是，洪宽村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个传奇。

